

# 「小王子」家族與歸化城 土默特部的開發

李華彥\*

摘要

歸化城聚落形成於 16 世紀的明朝嘉靖中期，城牆等工程則完備於稍後的隆慶、萬曆之交，此後直到清末，都是蒙古地區與長城以南往來的重鎮，且是漠南草原的政治、商業和藏傳佛教中心。歸化城的演進歷史，研究者不少，但對於其興起背景、時間，和住牧當地的蒙古土默特部源流，始終不見明確的說法。本文比對 17 世紀初成書的蒙文譯本《阿勒坦汗傳》與明人寫的《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發現歸化城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即明朝封的順義王俺答，為該城建立最重要的推手。阿勒坦出身元順帝後裔，是北元消失後，再度一統蒙古各部的第四位「小王子」達延汗之孫、巴爾蘇博羅特汗之子，從他身上可以充分體會到蒙人重視血緣、家系的傳統，及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名號在蒙古世界的號召力，他經由征戰，帶領宗族部落邁向強盛，中年則嚮往農耕定居生活，屢次嘗試與明通商，最終簽訂隆慶和議，使歸化城土默特部繁榮超越察哈爾的蒙古大汗本支，甚至隱隱領先王族。本文釐清 15 世紀「小王子」家族和瓦剌部也先家族的關聯，以了解阿勒坦汗與歸化城發展的軌跡，及其初期商貿範圍。

**關鍵詞：**歸化城、俺答、小王子、蒙古史、封貢貿易

---

\* 樹德科技大學通識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 一、問題意識與前人研究回顧

歸化城即今日內蒙古的大城市——呼和浩特，意為「青色的城市」，又作「庫庫和屯」，由晚明蒙古草原上著名的阿勒坦汗（1508-1582）所建，<sup>1</sup>用以發展對明貿易、作為引入藏傳佛教的弘法地，並為漸趨定居生活的土默特部之政教象徵和根據地，擔負發揚、傳承蒙古精神與文化的任務。

阿勒坦即明代著名的俺答（亦作俺荅、安灘、俺答哈），<sup>2</sup>是重新一統蒙古的達延汗伯顏猛可（1474-1517）之孫，伯顏猛可則是第四位被稱作「小王子」的蒙古大汗。達延汗號稱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血脈，明人卻認為其出自明初蒙古瓦剌部酋馬哈木（?-1416），非北元大汗直系的韃靼部。馬哈木登臺於永樂七年（1410）五月，他和汗廷太保阿魯台（?-1434）對峙，轉赴明朝請封，獲順寧王號，居牧哈密、土爾番兩城之西至撒馬爾罕一帶，<sup>3</sup>家族長盛，景泰四年（1454），其孫也先（1407-1454）被明詔書稱為「瓦剌可汗」，挾中原威勢橫行蒙古，又移居漠南的上谷，帶動大批蒙人自漠北移入，是寇擾明邊最久的勢力。<sup>4</sup>這段歷史耳熟能詳，是漠南草原出現阿勒坦家族和歸化城的先聲，其間緣由不明，後文將予分析。

阿勒坦在中國大陸研究者甚多，劉曉梅、馬曉麗〈國內二十年來俺答汗研究述評〉一文介紹，研究者偏向從王朝體制角度看待他的作為，如：解讀其引黃教入內蒙古，目的在建立權威，西征青海則在拓地爭資源、逼貢明朝，較少從遊牧民族習性、氏族

<sup>1</sup> 戴學稷，《呼和浩特簡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31、頁42。

<sup>2</sup> 黃麗生，《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臺北：蒙藏委員會，1997），頁1。

<sup>3</sup> 明·陳誠，《西域行程紀》（《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景印明抄本，第106冊，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4-6；明·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雍正七年刻本，集部第2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內篇卷1，〈別失八里〉、〈獅子賦〉，頁17-21、頁40。

<sup>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刻本，史部第3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4、頁7、頁11-12。

恩怨等方向理解，可用許多新譯的蒙藏文史料補充。<sup>5</sup>唐玉萍之文則大致回顧阿勒坦一生，認為他察知時勢所趨，主動促進與漢、藏兩族間的和平關係，為蒙古帶來繁榮發展的機會。<sup>6</sup>本文希望縮小視野，運用蒙文譯著，考證阿勒坦家族史細節，以解讀他能帶動蒙古地區再次興盛的原因和契機。

晚明時，蒙古與漢藏關係的改善，歸化城（呼和浩特）是一重要場所，戴學稷《呼和浩特簡史》為此城的「通史」。戴氏考證當地前身為漢朝定襄郡、北魏盛樂附近、隋唐東突厥地、遼金豐州及富民縣，和元朝中書省的大同路豐州；產業上，北魏初，執政者在此推行農耕，西元1005年更設立榷場，徵收商稅，迄明初的豐州時，因戰火摧殘，人口遷盡、農園荒蕪，15世紀末，蒙古韃靼部的達延汗擊敗瓦剌部，重建汗權，將漠南蒙古左、右翼共6萬戶分封給子孫，此地才出現復興跡象。達延汗孫——土默特萬戶阿勒坦汗，1520年代遷牧至此，即豐州或烏蘭察布盟，畜牧頗盛，晚明六十多年間，輸入長城內逾300萬匹馬，土默特之名因此與地連結，他又迎西藏黃教喇嘛前來弘法，開啟蒙古崇信藏傳佛教和大興寺召的風氣，歸化城遂成為內蒙古政經教中心。<sup>7</sup>本書劃出內蒙古地區史的研究範圍，但上溯歸化城史逾千年，亦未載北元政權的變動，尚可加以補充。

歸化城還有一孿生組合——綏遠城，黃麗生《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一書認為，這兩城的初期發展與軍事密切相關，越後期則越趨向商貿性質城市。書中對於歸綏前史，包括前套平原的族群變化，回溯達千年，專論兩城發展的章節涵蓋亦有三百多年，包羅甚廣，開創了諸如：戰爭如何引導其發展、該地是否為清朝內地赴蒙貿易的照票中心、民國初年兩城的工商業發展等多項議題的

<sup>5</sup> 劉曉梅、馬曉麗，〈國內二十年來俺答汗研究述評〉，《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3（煙臺，2016.5），頁77-84。

<sup>6</sup> 唐玉萍，〈俺答汗在明代蒙漢關係中的作用〉，《社會科學輯刊》，1996：6（瀋陽：1996.11），頁107-112。

<sup>7</sup> 戴學稷，《呼和浩特簡史》，頁8-100。

研究。<sup>8</sup>不過，仍需更多史料釐清建城年代和背景、長城邊境地貌的影響、歸化城軍政商民等管轄權之歸屬、官廳的數量和建制，以及行社、商號、產業發展等議題，以填補六百年變化之細節。

黃麗生另一本《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以歸化建城者阿勒坦仿效先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 在位）推行佛教一事為主，點出該傳記闡釋蒙古傳統「政教合一」精神的內涵，企圖重建民族意識，提振 17 世紀初土默特部汗王漸衰的威勢，供特定政治目的使用。黃氏定義該傳是元朝結束後最早的蒙文史著，也是蒙文中罕見的地方史、個人史撰述，說明成吉思汗黃金家族雖尊貴，但部落軍事、經濟實力更受重視，而汗王武功有成後，都會仿效忽必烈和國師八思巴（1235-1280）的典範，扶持佛教，尋求達賴喇嘛等級的教主加持，以圖權勢被蒙古世界廣泛認可，傳之後世，庇佑子孫政權，故該傳花極大篇幅敘述阿勒坦晚年營建歸化城、邀達賴三世（1543-1588）至土默特傳法的過程。<sup>9</sup>阿勒坦引入社會背景、內涵與蒙古相近的黃教，鍾梅燕認為他是想充實本族文化素質，改善嗜殺習俗，此舉則帶動蒙藏兩族的密切往來。<sup>10</sup>以上研究深入論述蒙藏佛教交流的過程，較少著墨於歸化城的興建緣由、阿勒坦家系與軍事成就，本文可為之補充。

關於歸化城早期的政商情勢，牛淑貞的論文有詳細介紹。她分析明朝加封表達善意的阿勒坦，藉邊境市場的通商權分化蒙古各部，羈縻靖邊，但阿勒坦逝後，需求明朝物資卻無權貿易的察哈爾高原林丹汗（1592-1634，1604-634 在位）、金主皇太極（1592-1643，1626-1643 在位），相繼入侵歸化城，強行取代土默特部的通商權，使歸化城長期扮演戰略要地和轉運生活物資的草原重鎮。<sup>11</sup>雲和義之文則討論歸化城由牧轉農的土地利用方式，還有土默特部的源

<sup>8</sup> 黃麗生，《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世紀中至20世紀初）》（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sup>9</sup> 黃麗生，《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頁70-88。

<sup>10</sup> 鍾梅燕，〈俺答汗與蒙藏民族文化變遷與認同——一個民族文化「引入」的個案〉，《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3（蘭州，2013.5），頁30-35。

<sup>11</sup> 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內蒙古大學學報》，45：4（呼和浩特，2013.7），頁85-90。

流、世系，但跨越時段稍長、史料不多，論點可再加強。<sup>12</sup>這兩篇文章都論及歸化城因明蒙金三方的軍事、商業關係而日形重要，但該城受政治演變的影響部分，還待研究。

整個明朝對蒙古的戰略方面，Peter C. Perdue 專書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第二章予以詳細地分析。他認為永樂帝五次北征，具有很大的震懾作用，蒙古在此期間開始分裂，漸分韃靼、瓦剌兩部，明朝又以開邊市為策略，獲取戰馬，允許蒙古在此交易布疋等生活用品；土木堡之變後，轉向內縮策略，大修長城、倚牆固守；隆慶和議後，則茶馬貿易成為固定策略。總體上，正統之後明軍衰弱，故對蒙戰略中，商業愈益重要。本書論明蒙關係時，兼論俄羅斯的發展，往下則討論清帝如何取捨、仿效明朝的對蒙方略，但置 14 世紀至 16 世紀的蒙古情勢不論，特別是北元傳承及其衍生出的各部落分合關係，僅略論脫脫不花（1416-1452，1433-1452 在位）、達延汗、阿勒坦等著名的蒙古領袖，和王崇古（1515-1588）等數位明督撫的事蹟，便算討論了明朝三百年的對蒙政策，史料或待加強，而明蒙的隆慶和議、茶馬貿易及元世系等議題，尚有很大的填補空間。<sup>13</sup>

土默特汗兼順義王世系，是歸化城發展史的重要軸線，有些論文也在釐清這點，如：森川哲雄的論文回溯晚明歸化城汗王的傳承世系，但內文兼述 1618 年至 1619 年俄國赴明朝使節團之見聞，故討論阿勒坦家族和爭位問題時，略顯紊亂；<sup>14</sup>王得勝之文論證清乾隆以後，阿勒坦裔——世襲輔國公的喇嘛札布一支和屬部，是歸化城土默特部的主要居民；<sup>15</sup>白初一之文則檢示順義王世系和清代歸化城的設官這兩大議題，但若分為兩篇論文，或許更

<sup>12</sup> 雲和義，〈北元至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由牧轉農的政策考探〉，《內蒙古農業科技》，2013：2（呼和浩特，2013.4），頁5-6、頁10。

<sup>13</sup>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London: Cambridge, 2005), pp. 51-93.

<sup>14</sup> 森川哲雄，〈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歸化城〉，《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5：3-4（呼和浩特，1985.12），頁12-19。

<sup>15</sup> 王得勝，〈居歸化城之土默特輔國公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7：4（呼和浩特，2005.7），頁59-61。

能解析清楚。<sup>16</sup>另外，尚有出版於1954年的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之書，將土默特汗王世系議題擴大為部落源流制度之考證，為研究明清時期蒙古社會的開山作之一，說明土默特部出自達延汗將6萬戶組織分給7子，形成了12個鄂托克——內喀爾喀（內蒙古）5個、外喀爾喀（內蒙古）7個，其中，東外蒙的喀爾喀萬戶，由么子格呼森札札賚爾琿台吉（生卒年不詳）領導，其子阿勒坦以土默特部為基地，1552年從衛拉特部之手奪回和林，因而在蒙古草原上與札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車臣汗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並稱。內蒙諸部後歸附金主努爾哈赤（1559-1626，1616-1626在位），並於皇太極天聰年間設旗，納入八旗制度管理；外蒙諸部在崇德時與金貿易，但關係疏離，直至順治末才入覲；康熙中葉噶爾丹之戰則是內外蒙一致投清的轉折點，蒙古因此增設許多新旗。<sup>17</sup>本書重解釋制度名詞，較無達延汗家族如何影響土默特部發展的說明。

綜合以上內蒙古歸化城土默特部史的各项研究，可知15世紀至16世紀蒙古草原情勢和北元達延汗家族源流，仍然模糊不清，卻是土默特部阿勒坦汗興起的重要背景，相關史實需要重建，才能瞭解1550年至1650年前後，內蒙地區再度被積極開發的原因，與歸化城建立的動機。本文便以此前後相承的二元題目，作為討論主軸。

## 二、北元「小王子」世系演變對漠南草原的影響

明代內蒙古能夠重新繁盛，是因為達延汗振興元帝裔權威、重建蒙古中心汗廷，其子孫又能以當地為據點，延續實力，四出開拓。這段歷史甚為混亂，長期阻礙明蒙關係的研究，有必要釐清，方能理解後來的阿勒坦汗何以憑血緣，就足以號召蒙古世界，復期望藉宗教光耀血緣、保持功業。本節將在考證達延汗家

<sup>16</sup> 白初一，〈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兩旗職官及戶口初探〉，《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3：1（赤峰，1992.4），頁74-80。

<sup>17</sup> 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頁73-79。

系的過程中，呈現蒙古的部落習性、繼承原則和久亂望興的民族嚮往，如此較易抓住阿勒坦汗和歸化城順應時勢而生的主軸。至於靠阿勒坦汗二次中興，受其扶助而盛的達延汗諸子，代表性稍弱，略敘從事。

元順帝（1320-1370，1333-1370 在位）棄大都返草原，北元開始，至末代可汗脫脫不花（又譯稱普化）為止，共遞嬗七次、八主，約八十年間，僅維持表面一統，汗廷無力統合各部，甚至不能保證汗位穩定傳承。<sup>18</sup>景泰二年底（1451，北元蒙古無清楚紀年，故本文用明年號，下同），出身瓦剌部的太師也先，因作為脫脫不花汗正妻的親姊之子未當太子，起兵攻汗廷，可汗出逃，<sup>19</sup>死於容身的兀良哈部，家人被也先聚殲，明人以此為北元帝系終止，開啟往後百年的「小王子」時代，可汗或由也先後裔僭稱，或由元帝旁支子孫出為傀儡，混亂異常，蒙古草原發展大衰。<sup>20</sup>

傳統以為順帝北遷，蒙古就分裂為韃靼、瓦剌兩部，實是誤解。明人一般認為瓦剌部在甘州、涼州之北，馬哈木是洪武末當

<sup>18</sup> 如永樂二十年（1422），權臣阿魯台殺可汗本雅失里；永樂二十二年（1424），瓦剌酋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為可汗，而脫脫不花之兵力少於馬哈木子——權臣也先，極為弱勢。參見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萬曆二十八年刻本，史部第1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14，頁12-13；明·鄧元錫，《皇明書》（《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萬曆三十四年刻本，第3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6，頁13。

<sup>19</sup> 明·陳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以下諸《明實錄》版本均同），卷213，頁6，景泰三年二月壬午條；同書，卷220，頁7，景泰三年九月庚子條；明·廖道南，《楚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史部第4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孚諫內紀後編〉，卷26，〈朱英〉，頁13。

<sup>20</sup> 明·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四年刻本，史部第1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10，〈夷部考〉，頁16；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11。北元約八十多年，八位可汗傳位順序、來歷和時間，大致如下：元順帝（洪武三年逝）、愛猷識里達剌（洪武十一年逝）、脫古思帖木兒（即崇禮侯買的里八剌，洪武二十一年被弒）、坤帖木兒（去帝號、稱可汗，建文三年逝）、鬼力赤（非元苗裔，來自韃靼，三公都妄稱可汗，蒙古開始分東韃靼、西瓦剌，永樂六年被弒）、本雅失里（元苗裔，太保阿魯台立，永樂十年被阿魯台或瓦剌馬哈木所弒）、答里巴（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即普化，元苗裔，永樂二十二年由瓦剌王馬哈木所立，景泰二年被弒）。

地酋長之一，但查洪武二十九年（1396）三月，行人陳誠（1365-1457）越哈密、吐魯番，西抵中亞撒馬畏兀兒地面，奉命招撫「韃靼」，差使要見的其中一部首領，便是馬哈木，<sup>21</sup>則韃靼就是瓦剌？再查瓦剌之地，位於哈密以北數百里，哈密是明成祖（1360-1424，1402-1424 在位）在嘉峪關以西設的 7 個衛所之一，馬哈木出身的瓦剌地面，不歸明境，<sup>22</sup>唯以地面稱其部落，<sup>23</sup>如嘉靖時陳九德（?-1567）所言：

昔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遁歸朔漠，其末帝，……諡為順帝。……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醜類，世數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宣宗皇帝時者，名普花，此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知，意必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魯阿台、曰順寧王脫懽。……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也先悉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普花娶也先妹以相固結。<sup>24</sup>

因馬哈木子托歡（?-1439）、孫也先獨盛一時，明人進一步將「瓦剌」指代其勢力所達的蒙古草原西部，後人也循此慣稱，不辨緣由，誤認北元遽分為東韃靼、西瓦剌，韃靼部才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正統。<sup>25</sup>其實，蒙古本為鬆散部落社會，漢人是帶有貶意地用

<sup>21</sup> 明·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內篇，卷1，〈撒馬兒罕〉、〈俺都准〉、〈八剌黑〉、〈迭里迷城〉、〈沙塵海牙〉、〈塞藍城〉、〈達失干〉、〈卜花兒〉、〈渴石〉、〈養夷〉、〈別失八里〉、〈土爾蕃〉、〈崖兒城〉、〈鹽澤城〉、〈火州〉、〈魯陳城〉、〈哈密〉，頁13-19；同書，卷2，〈陰山雪〉、〈歷官事蹟〉，頁8、頁38。

<sup>22</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九年刻本，第3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4，頁10、卷25，頁24-25。

<sup>23</sup>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史部第3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卷14，頁14；明·胡世寧，《胡端敏公奏議》，收入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集部第2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卷135，〈復土魯番議疏〉，頁16-27。

<sup>24</sup> 明·陳九德，《皇明名臣經濟錄》（《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史部第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卷2，〈王振之變一〉，頁10。

<sup>25</sup> 如明朝官方稱：「北狄，韃靼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兀良

「韃靼」泛稱全蒙古人。<sup>26</sup>

馬哈木是所謂「瓦剌部」的奠基人，其孫也先則使家族聲勢達於頂峰。明初的北元可汗鬼力赤（1379-1408，1402-1408在位），非黃金家族後裔，故蒙古諸部多叛走，馬哈木也不奉指揮，甚至恃強兵與汗廷相攻殺，永樂元年（1403），又與汗廷太保阿魯台同時通貢明朝，互別苗頭。明廷認韃靼部的鬼力赤是正統，賜璽書，明人因此以為蒙古分裂為東韃靼、西瓦剌。<sup>27</sup>鬼力赤與繼任的本雅失里汗（1378-1411，1408-1412在位）雖然都入貢，卻殺明朝來使，明廷憤而援蒙古他部為助，期待制衡北元汗廷，遂於永樂七年五月冊封瓦剌三酋馬哈木等為順寧王等銜，賜印綬，用來掣肘本雅失里，十月，更興築殺胡、平胡等堡寨（後來的山西大同府區），積極儲糧備戰。<sup>28</sup>漠南草原因此重新熱鬧起來。

15世紀北元汗廷衰弱，對比明成祖五次出塞親征的威勢，蒙古各酋均拉攏明朝以自壯。<sup>29</sup>永樂十六年（1418）四月馬哈木子托

---

哈、西哈密、北瓦剌，瓦剌強，數敗韃靼……瓦剌酋馬哈木封順寧王，韃靼酋阿魯台……景泰元年，阿剌知院遣人貢馬請和，賜敕諭意，復貽書瓦剌可汗，賜也先敕，遺可汗也先阿剌金幣。」參見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萬曆刻本，第79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07，〈迤北小王子瓦剌三王〉，頁1-2。

<sup>26</sup> 明·蔡憲臣，《清白堂稿》（《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崇禎刻本，陸輯第2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庚子答銓問八條〉，頁23；明·陳全之，《蓬窗日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靖四十四年刻本，第11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1，〈諸夷〉，頁68；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天啟刻本，第5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61，〈王英〉，頁38。

<sup>27</sup> 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太宗實錄》，卷93，頁5，永樂七年六月癸丑條；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14，頁41。鬼力赤汗，疑為圖1中的額色庫汗，即衛喇特克呼古特的烏格齊哈什哈之子，洪武二十年丁卯生，永樂十三年乙未29歲即位，洪熙元年乙巳39歲歿，參見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文津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四年校本，第141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卷5，〈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7-8。

<sup>28</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4；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太宗實錄》，卷93，頁5，永樂七年六月癸丑條；同書，卷97，頁1，永樂七年十月己亥朔條。

<sup>29</sup> 明·王鳴鶴，《登壇必究》（《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刻本，第96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3，〈敕諭三衛屬夷〉、〈不許阿魯與吐蕃諸部合款〉、〈安遠侯柳升等破虜〉、〈親征虜寇阿魯台〉、〈召諸將論用兵之法〉、

歡襲封順寧王後，持續貢馬直到宣德初，阿魯台等也紛起入貢，<sup>30</sup>可汗卻隨權臣挾持而四處漂泊，如：宣德七年（1432），太保阿魯台敗兀良哈部，汗廷移駐遼東，兩年後，托歡攻滅阿魯台，汗廷又移至漠北，末代脫脫不花汗（即普化）毫無實權。其後，瓦剌部托歡獨盛，挾可汗攻他部、通貢明朝，<sup>31</sup>正統六年（1442），其子也先繼任太師、淮王，嫁姊於脫脫不花，自己又向明請婚，情形如下：

也先遂因通事人，請婚中國。通事人佯應曰諾，……也先復大喜，自以為得和親中國，迺誇詡張諸酋，洋洋大自雄也。……其（正統）十四年春，遣二千人大貢馬為聘，而（明）朝廷曾未知之也。……也先始大媿，其七月，盡發其種落，大入雲中、上谷邊。<sup>32</sup>

這便是著名土木堡之變的由來。

也先是蒙古的「小王子」稱號和漠南勢力的開啟者。景泰四年（1453），北元末代脫脫不花汗被弑，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天聖）大可汗」，自立瓦剌部新汗廷，但明人知他非元裔，賜詔僅稱

---

〈大軍直搗虜穴〉、〈旋師剿虜黨兀良哈〉、〈論不窮追阿魯台命班師〉，頁88-94；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太宗實錄》，卷90，頁1，永樂七年四月丁丑條。15世紀蒙古分裂成多部勢力，各部紛紛爭取明朝封爵、互市貿易，以威嚇其他部落，參見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pp. 52.

<sup>30</sup> 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太宗實錄》，卷199，頁2，永樂十六年四月甲辰條；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宣宗實錄》，卷33，頁8，宣德二年十一月壬寅條。

<sup>31</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7-8；明·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卷10，〈夷部考〉，頁17；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天啟刻本，子部第2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224，〈四夷一〉，頁21；明·何喬遠，《名山藏》（《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史部第4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卷108，〈王享記四〉，頁8-9。

<sup>32</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7-8；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15，頁34、頁35-36；明·方孔炤，《全邊略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刻本，第73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頁10；明·何喬遠，《名山藏》，卷108，〈王享記四〉，頁10-11。

「瓦剌可汗」，<sup>33</sup>其政權持續通好明朝以威嚇蒙部，故不再南侵，還移住上谷之地（宣大），即漠南草原，卻成了明朝漠南外患的起源。《萬曆武功錄》云：天順元年（1457），也先被部下平章哈剌（生卒年不詳）擊敗，逃亡而死，其子或脫脫不花之子，被舊北元權臣孛來（?-1465）立為可汗，因脫脫不花號「大王」，此子便號「小王子」，實屬僭越，但此時北元汗廷早已隨大王之死而消失。<sup>34</sup>有明人認為「小王子」是阿勒坦汗先祖，<sup>35</sup>但這與《萬曆武功錄》所載七位「小王子」瓦剌可汗一樣，都須再加考證。

「小王子」一詞，似乎只有明人使用。蒙古習慣將父子孫襲用有歷史意義或傑出的英雄稱號，<sup>36</sup>明人因此經常混淆可汗名號，把數人當作同一人，或一人誤為好幾人，「小王子」便是一例，明中葉人士多以此指稱蒙古可汗，卻不在乎是說第幾代小王子、他們彼此的關係，造成理解上的困擾。著名的達延汗「因年幼即位，亦稱小王子」之說，很可能源於明人這種記史疏漏，<sup>37</sup>當時蒙人可能也未以「小王子」來稱呼大汗。小王子世系，是理解15世紀至16世紀蒙古各部門爭和漠南草原因此再獲移民和開發的經線，須先予釐清。《萬曆武功錄》成書於17世紀初，是記載「小王子們」年代最清晰的明人史料，本節將以之與同時期成書、蒙人撰著中最早錄有相關事蹟的《阿勒坦汗傳》，及清代蒙古台吉所撰

<sup>33</sup> 明·陳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英宗實錄》，卷236，頁3-4，景泰四年十二月癸巳條；明·馮夢龍，《智囊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明刻本，子部第13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卷4，〈陳希亮等四條〉，頁18。

<sup>3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1-12；明·何喬遠，《名山藏》，卷108，〈王享記四〉，頁14；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卷17，頁15-16。宣大即上谷之地，參見明·艾穆，《艾照亭先生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萬曆刻本，伍輯第2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賀少司馬吳環洲總督宣大軍門序〉，頁3-4。

<sup>35</sup>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初刻本，第1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23，〈覆宣督塘報邊情疏〉，頁18。

<sup>36</sup> 蒙古稱號的襲用，如蒙古右翼永謝布萬戶的喀喇沁領主拜薩哈勒台吉，號「巴圖魯」，即勇士之意，其長子、次子也都襲用「巴圖魯」稱號，所以明人以「老把都」稱呼拜薩哈勒台吉，以區別父子。「把都」，即「巴圖魯」之轉音，參見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頁19，註4。

<sup>37</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1-12，第13段韻文註2。

《蒙古源流》作比對。

《萬曆武功錄》共有七位瓦剌可汗被稱作「小王子」，依序是：也先之子（天順元年立，1457，旋被殺）、脫思（也先之子的堂兄，天順五年六月立；成化元年九月不知所終，1465）、瓦剌部酋滿魯都（亦作滿都魯，成化元年僭稱可汗，封哈密北山旱西洋部酋亂加思蘭為太師，十八年冬死）、把禿猛可（成化十八年冬立；弘治元年冬死，1488）、伯顏猛可（把禿猛可之弟，弘治元年立；正德七年禪位，1512）、阿不亥阿著卜孫（伯顏猛可次子，正德七年冬立，十六年死，一說死於十四年）、卜赤（伯顏猛可長房長孫，正德十六年立，旋死；卜赤又作博迪，一說正德十四年即汗位，嘉靖二十六年 44 歲時去世，1547）、不及兒台吉弋明（卜赤之弟，嘉靖初立；疑與卜赤為同一人）。第四位小王子伯顏猛可，即中興蒙古的達延汗、阿勒坦汗祖父，<sup>38</sup>但書中並未說明小王子們是否全出身瓦剌部，彼此親屬關係亦不明。

《阿勒坦汗傳》的北元帝系和內文，可稍事補正《萬曆武功錄》中的可汗傳承關係。<sup>39</sup>本傳原藏於清朝札薩克和碩車臣親王索達尼（生卒年不詳，順治十五年襲位）家，傳末第 393 段文字錄有其家族 21 代世系，與小王子傳承最相關的一段是：元順帝（烏哈噶圖汗）、烏斯哈勒汗脫古思帖木兒、哈爾古察克都古楞黃台吉、阿寨台吉、阿噶巴爾濟、哈爾古察克台吉、博勒呼濟農、達延汗、達延汗長子圖魯博羅特。<sup>40</sup>如這段譜系為真，則《萬曆武功錄》中小王子世系出自北元太師也先的瓦剌血統，非元朝帝裔的記載，就不成立了。

明人混淆蒙古世系，或許還因蒙古名的發音導致，記史者有可能將一個蒙古名的發音，轉寫成多種漢字組合，使一人故事變

<sup>38</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2-18；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37-38。

<sup>39</sup> 《阿勒坦汗傳》是蒙文譯本，原作則是舉世孤本，約成書於1607年，內容為16、17世紀蒙古土默特阿勒坦汗的事蹟，作者應是其家族親信，記事可信度高，參見黃麗生，《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頁16-22。

<sup>40</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82-184。此世系均是父子關係，但「阿噶巴爾濟」其人在書中並未插入排行，是由20世紀的譯者珠榮嘎在註8特別說明；阿噶巴爾濟作亂害死兄長岱總汗，被除名可以想見，詳見後文的圖1。元順帝是烏哈噶圖汗，參見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卷5，〈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1-2。

多人故事。<sup>41</sup>其次，明人的蒙古消息多刺探而來，或有誤解。此處先還原第四位小王子伯顏猛可，即達延汗（大元汗）的身分，《萬曆武功錄》中他襲位自兄長把禿猛可，<sup>42</sup>但蒙人寫的《阿勒坦汗傳》裡，滿都魯汗所封的博勒呼濟農名叫巴延孟克，成化十年（1474）生子巴圖孟克，即達延汗。<sup>43</sup>此處產生四個名字：第三位小王子把禿猛可、第四位小王子達延汗伯顏猛可、博勒呼濟農巴延孟克、達延汗巴圖孟克。

這裡先說明一下「達延汗中興黃金家族」之前，蒙古草原的重要變化，以利後續分析。《萬曆武功錄》說：滿都魯是瓦剌部酋，可能是第二位小王子脫思族人，成化元年（1465），與由哈密北部巴而思渴（今巴里坤）來河套住牧的乧加思蘭（生卒年不詳）相結，僭稱可汗，封乧加思蘭為太師。隨後，哈密的翁牛特部酋毛里孩（生卒年不詳），與兒子阿扯來（亦作幹赤來、幹赤來、火赤兒，生卒年不詳）也移往河套，與同部的乧加思蘭合作，稱雄於滿都魯汗廷和蒙古草原。成化十三年冬，乧加思蘭欲以阿扯來取代汗位，被滿都魯所殺，其族弟馬亦思（亦作亦思馬，生卒年不詳）繼任太師，驅逐博勒呼濟農巴延孟克，佔其群眾，弱化滿都魯勢力，而巴延孟克行至永謝布部被害。<sup>44</sup>

瞭解大致情形後，判斷前述四個蒙古譯名較為可行。《萬曆武功錄》說，成化十八年（1482）冬滿都魯死，太師馬亦思立第三位小王子把禿猛可為大汗，又死於弘治元年冬（1488），其弟第四位

<sup>41</sup> 明人記錄蒙古名字，用字並不精確，如同頁文字，哈密部酋「毛里孩」亦寫成「阿里孩」，其子「阿扯來」又作「幹赤來」，造成讀者極大困擾。欲理清這段蒙古史的輪廓，須反覆對讀《萬曆武功錄》和《阿勒坦汗傳》兩書正文及註釋，但前者紀年相對清楚許多，且比《阿勒坦汗傳》的註釋成書時間早、史料價值高，紀年仍應以它為準，參見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4。

<sup>42</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5。

<sup>43</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1-12、27。濟農是蒙古官名翻譯，職務是輔佐可汗掌管蒙古右翼，也就是明人所稱的瓦剌、西部蒙古一帶，地位僅次於可汗。

<sup>4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3-15；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3。

小王子達延汗伯顏猛可繼位。《阿勒坦汗傳》則說：

(13) 時有博勒呼濟農生名為巴圖孟克之子，其於一歲時離別其父落得孤苦伶仃，時有邪心的翁里兀特（翁牛特）恃強作亂，行將占其義母天賦完備之滿珠海哈敦（滿都魯汗妃，哈敦即皇后）。

(14) 此時她不忘昔日聖祖（成吉思汗），不為今時惡人翁里兀特、畏兀特之計所乘，將寶貝般之子從一歲起加以守護，向威力長生天賦祈禱稟奏：

(15) 「請上天之主鑒察心懷惡念之人」，她以虔誠之心堅定祈禱，將貴子小心謹慎地守護照看，使孛兒只斤黃金家族如意珠般繁榮興旺。

(16) 其義母額爾克楚特圖門（有權者萬戶）之女滿都海哈敦，與寶貝般好心之臣互相議商，如此一無失誤地守護達延汗，點燃權貴孛兒只斤火焰之情如此這般。

(17) 七歲時取義母為妻，四十萬蒙古聚會尚號達延汗，執掌朝政採納諸臣之言，安然整治（大國）之間。<sup>45</sup>

比對顯示，《萬曆武功錄》應是混淆了達延汗與生父之名，因發音太近，此外，第三位和第四位兩位小王子時期，其實只有滿都魯汗傳到達延汗一次，佐證是成化十八年至弘治元年，頭尾兩年都計入，共七年，正合《阿勒坦汗傳》所記，巴圖孟克7歲娶義母滿珠海哈敦為妻，同年並由蒙古東韃靼、西瓦剌（即衛喇特）兩部聚會，上尊號為達延汗的內容，這七年裡，沒有第三位可汗。

《阿勒坦汗傳》敘述北元汗廷事蹟，略去數代可汗傳承未寫，故此處加上清代蒙古台吉所撰的重要史書《蒙古源流》，補充討論，整理出圖1：北元帝系傳承，作為理解小王子世系的根據。

<sup>45</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1-14；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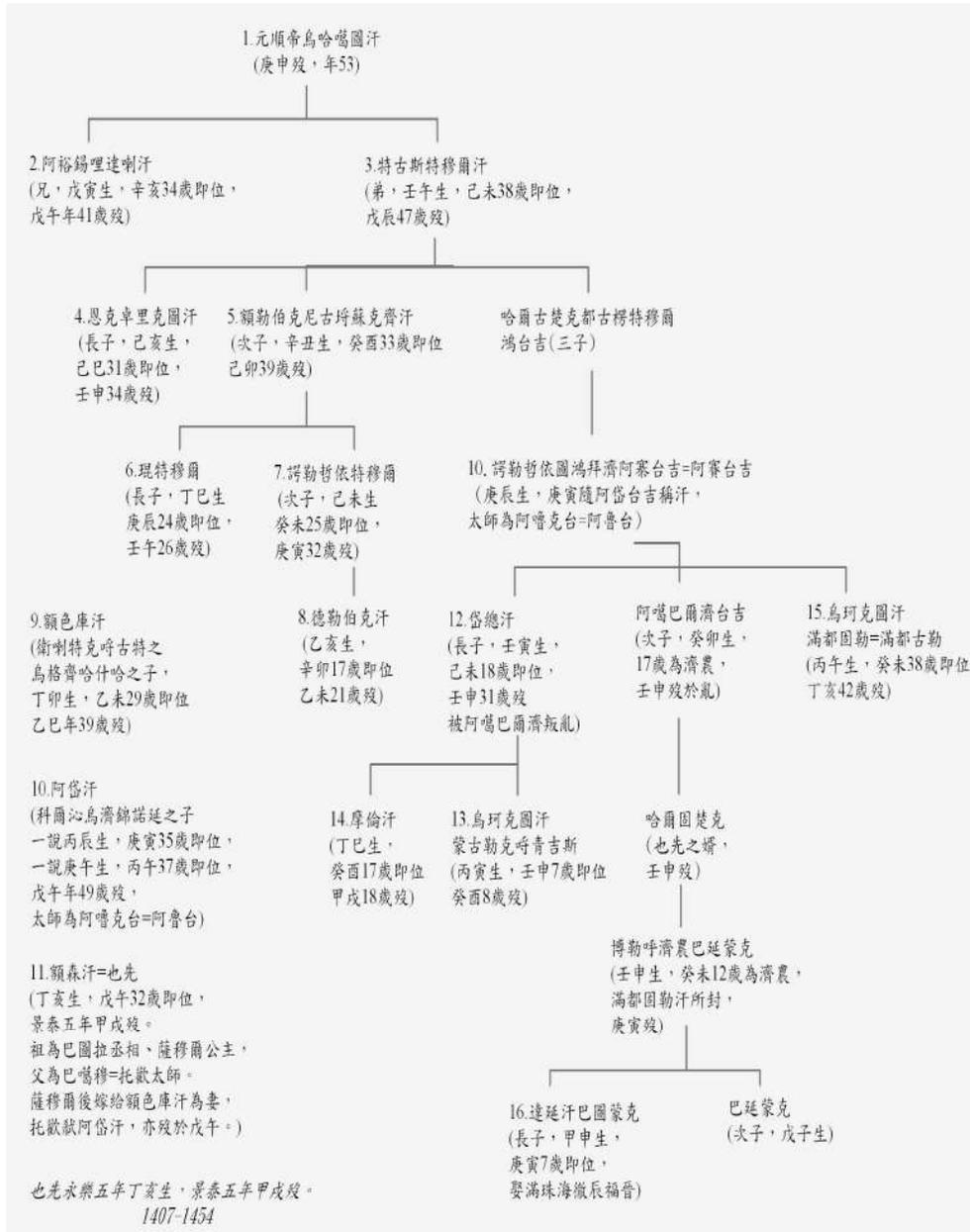


圖 1 北元帝系傳承<sup>46</sup>

<sup>46</sup> 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卷5,〈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1-26。也先卒年,參見明·陳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英宗實錄》,卷246,頁4-5,景泰五年十月甲午條。

明人史料裡的蒙古大汗名字，和蒙文史籍的完全不同，故先判定圖 1 中誰是北元末代可汗脫脫不花，較易理解。圖 1 有 3 處年代可供確認，最要者為額森汗也先，他與明對戰詳實可查，明人記載也最多，年份不易偏誤；其次是阿岱汗（1390-1438）、托歡並逝的戊午年；第三是岱總汗去世的王申年。也先生於丁亥年，即永樂五年（1407），被弑於景泰五年（1454）十月，歲次甲戌，依古代出生即 1 歲的虛歲算法，他 32 歲是戊午年，合於圖 1 說明，該年其父托歡弑阿岱汗，與汗並歿，為正統三年（1438）。<sup>47</sup>至於王申年岱總汗死，查也先存活時，僅景泰三年（1452）歲次王申，圖 1 中的蒙古大汗則均逝於 60 歲之前，無人能經歷兩個王申年，故也先所弑之汗，必是第十二位岱總汗，即北元末代可汗脫脫不花。

岱總汗脫脫不花死的景泰三年，是北元終止之年。圖 1 中，王申年是承先啟後之年，牽涉到五個人：岱總汗與弟阿噶巴爾濟台吉、侄哈爾固楚克死亡，第十三位烏珂克圖汗即位，博勒呼濟農巴延孟克出生。第十三位烏珂克圖汗蒙古勒克呼青吉斯，就是《萬曆武功錄》所稱的第一位小王子、也先之子；第十四位摩倫汗（1437-1466），是該書的脫思、也先子的堂兄。至於烏珂克圖汗何以被稱為也先之子？或許其母正是嫁給脫脫不花當正妻的也先之姊，而摩倫汗則是原本的太子，因也先不滿外甥未被立為太子，作亂弑君，故摩倫汗在弟弟烏珂克圖汗死後才即位。

《萬曆武功錄》裡未被計入小王子世系的滿都魯汗，其實正是圖 1 中的第十五位烏珂克圖汗滿都固勒，或叫滿都古勒，即第三位小王子，他傳位給份屬侄曾孫的第四位小王子達延汗巴圖蒙克，或叫巴圖孟克。至於《阿勒坦汗傳》裡清朝車臣親王家系：元順帝、烏斯哈勒汗脫古思帖木兒、哈爾古察克都古楞黃台吉、阿寨台吉、阿噶巴爾濟、哈爾古察克台吉、博勒呼濟農、達延汗，完全對得上圖 1 世次。因此，圖 1 就是北元帝系的傳承圖，岱總汗死於景泰三年王申，標誌著北元終止、小王子世系開始，第

<sup>47</sup> 明·陳文等修，黃彰健校勘，《明英宗實錄》，卷 246，頁 4-5，景泰五年十月甲午條。

十三位烏珂克圖汗是第一位小王子，而所有小王子都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子孫。

至此可以理解，蒙古草原一直尊崇成吉思汗家族，公認他們才是正宗蒙古大可汗的來源，歷明朝取代元朝兩百年而不衰，此為查探阿勒坦汗功業前須有的概念，本節考證北元、小王子世系，更證明這個價值觀。此外，無論大王還是小王子，同一時間裡，蒙古草原只會存在一位正宗大可汗，代表全蒙古，他無分號。雖然從北元開始，蒙古大汗就淪為兵力衰微的政治傀儡，汗廷任歷屆太師、權臣、強酋搬遷左右，但草原上的大汗，還是必須出自成吉思汗黃金家族血脈，這點，連瓦剌三代強酋也先都違拗不得。

### 三、阿勒坦汗家族與土默特部之開發

「小王子」世系的傳承在 15 世紀歷經波折，至達延汗而終歸一統，開啟 16 世紀黃金家族政權重興和歸化城土默特部的繁榮契機。學者黃麗生認為 14 世紀至 20 世紀土默特（歸綏）呈現「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的變化，而阿勒坦汗與歸化城最終幾乎成為蒙古政權新中心，除了蒙人從元朝的富庶重歸游牧生活，有轉化困難，相當程度仍需倚賴中原經濟供給之外，政治上也亟待重建一個長久認同和共利的體制，統合各部，防止大家退回原始的掠奪競爭、自相殘殺狀態。<sup>48</sup>這裡指出了阿勒坦汗以具強盛武功的達延汗孫身分，在蒙古世界帶起的新希望，而此矚目的火炬，又能藉其引進佛教、與明議和通商兩重大舉動，而能長久延續下去，此亦歸化城土默特部開發的最大時代意義。

土默特部真正綻放出城市貿易的曙光，是在 16 世紀初達延汗子孫兩代合力締造輝煌戰績之後。土默特即豐洲灘，是第四位小王子達延汗巴圖孟克之孫——阿勒坦的根據地，他早年繼承祖先游牧征戰的習性，建功拓土，致力讓小王子家族實質牢固地控有

---

<sup>48</sup> 黃麗生，《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頁 6-9、頁 101-121。

全蒙古，中年則開始傾向定居生活。他是率先看見城市、定居、貿易之利的蒙古領袖，帶領蒙古右翼（西部蒙古）邁向軍事尾聲，迎向和平繁榮，並向全蒙古展示農商、佛教之力。

阿勒坦汗是達延汗之孫，父輩有十一人，製表如圖 2。達延汗長子圖魯拜呼（1582-1654，1606-1656 在位），明人稱「鐵力擺戶」，勢力範圍在蒙古左翼的察哈爾高原上，是晚明林丹汗的先世，也是小王子世系可汗傳承最重要的正宗長房；次子烏魯斯拜（1482-1509），明人稱「阿爾倫台吉」，正德四年（1508），受達延汗封為蒙古右翼三萬戶濟農，到任之初，便被衛兀特部的永謝布領主伊巴賚太師（生卒年不詳），聯合鄂爾多斯部領主滿都賚阿勒固呼（生卒年不詳）殺害，後二者立刻遭達延汗討伐，逃奔青海，<sup>49</sup>這段經歷，《萬曆武功錄》誤記道：

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遁入於海西，居青海，蠶食諸番夷，諸番夷畏之，而河西始有虜患矣！<sup>50</sup>

兩相對照，明人所記錄的「虜情」，閱讀時不可盡信。

後達延汗時期的蒙古汗廷，或小王子汗廷，隨其長子一脈居地而長期移駐察哈爾高原，為大宗可汗系統。清代蒙人所撰《蒙古源流》，記載黃金家族源出佛陀故鄉——印度半島，譜系中尚有娶唐朝文成公主（623-680）的藏王松贊·干布（604-650，629-650 在位），顯示蒙人自認的活動空間，包含全蒙古草原、青康藏高原，乃至恆河流域，<sup>51</sup>而明代的蒙古人或小王子家族，正活躍於此寬天闊地，甚至到達後來的新疆之地。

<sup>49</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6、頁23-24。

<sup>50</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7。

<sup>51</sup> 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卷1，〈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15-28；同書，卷2，〈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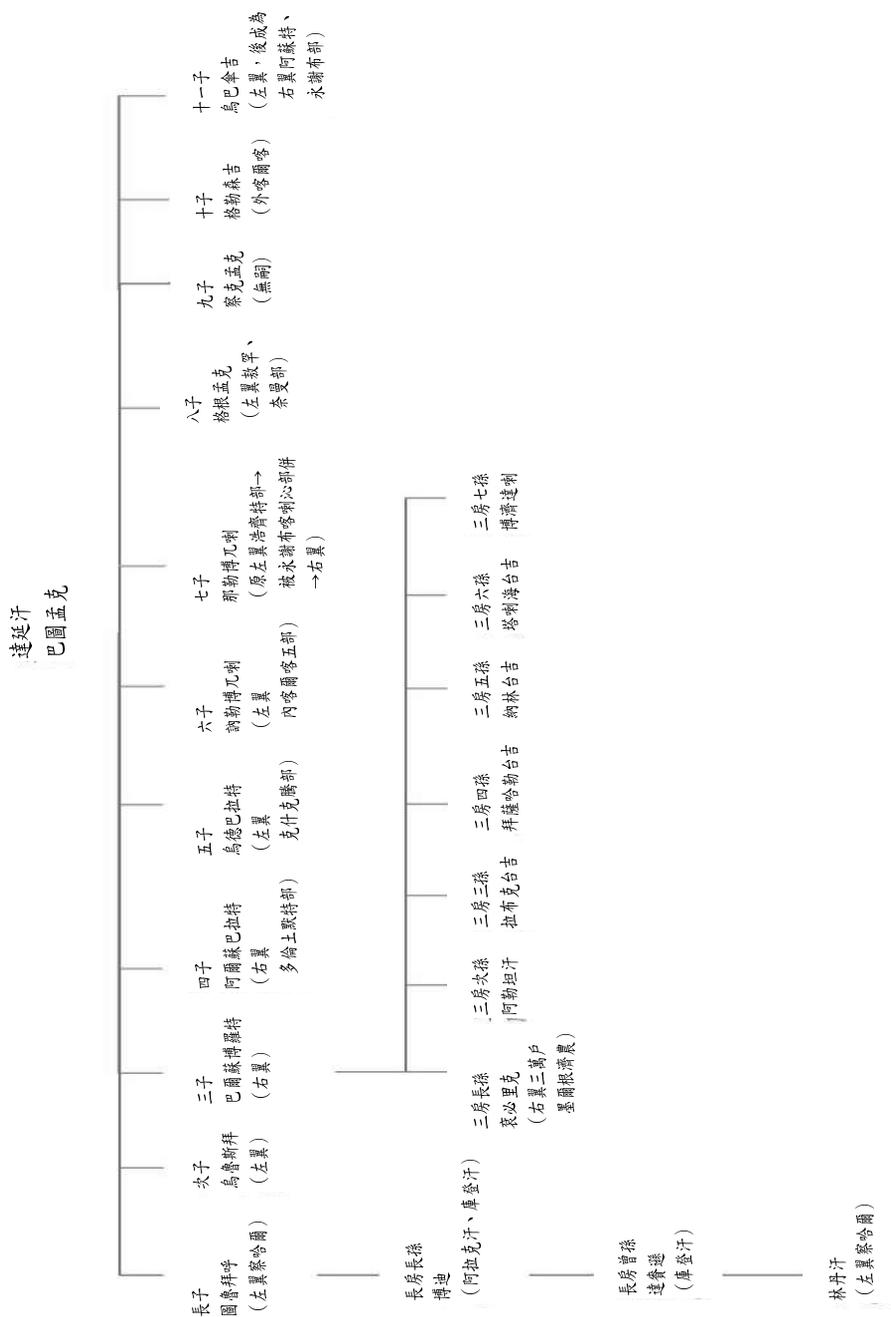


圖 2 達延汗子孫世系<sup>52</sup>

<sup>52</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燾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5-18。圖1的拜呼、斯拜、博羅特，均作「博羅特」解。

圖 2 的烏魯斯拜之死，使阿勒坦之父——達延汗三子巴爾蘇博羅特（1490-1531）出頭。該亂事迫巴爾蘇博羅特攜眷逃往父汗駐地，阿勒坦因此就養於蒙郭勒津土默特部烏由罕（高官夫人）之手，與四叔阿爾蘇巴拉特（生卒年不詳）等同住，在正德五年（1510）晉見達延汗。蒙郭勒津土默特部領主浩綏諾延（又作浩賽塔布囊，塔布囊即駙馬，生卒年不詳），是滿都魯汗女婿，強悍善戰，為患明邊，明人稱為「火篩」，此際與達延汗父子合作，出動蒙古左翼之兵，在土默特北部的大青山殲滅殺害烏魯斯拜的衛兀特部、收服鄂爾多斯部，凱旋而歸。局勢太平後，巴爾蘇博羅特大受父汗倚重，正德七年（1512），繼烏魯斯拜出任蒙古右翼三萬戶濟農，駐鄂爾多斯萬戶，地位僅次於達延汗，使明人以為他此年就當了可汗；十二年，達延汗死，兩年後，巴爾蘇博羅特繼位，號「賽音阿拉克汗」，明朝稱為阿不亥阿著卜孫，即第五位小王子。<sup>53</sup>

正德十四年（1519）賽音阿拉克汗登位，大大提升三房一支在蒙古世界的地位和右翼草原的發展。根據圖 2，賽汗巴爾蘇博羅特有 7 子，長子袞必里克（1506-1542）繼承父親右翼三萬戶濟農之位，相當於漢人社會的輔政親王，號「墨爾根」，駐紮鄂爾多斯萬戶，所轄蒙古右翼大致是今河套地區，後成為阿勒坦汗根據地。袞必里克即明人熟悉的「吉囊」、阿勒坦或「俺答」之兄，實則吉囊就是濟農，並不是他的名字。<sup>54</sup>

袞必里克兄弟主要靠自身努力而強大，因其父汗登位當年旋逝，年僅 30。袞必里克攜長於豐州城的大弟阿勒坦，活躍於嘉靖初的戰爭，北攻兀良罕、西攻畏兀特、南攻明朝，其「墨爾根」號，即因跟隨達延汗長房長孫——博迪汗征兀良罕（1504-1547，1519-1547 在位）有功，由後者授予，此顯示汗位在巴爾蘇博羅特逝後，又回到長房一支繼承。達延汗世系的勢力有多大？計袞必里克部眾約五萬人；阿勒坦擁火篩部，三萬人；第六、第七位小王

<sup>53</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17；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16、頁 24-27。

<sup>5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18；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42。

子應是同一人，即博迪汗，明人稱乜明，居薊遼，遷徙無常，四萬人；達延汗四子阿爾蘇巴拉特，領右翼多倫土默特部，明人稱「滿官嗔」或滿冠部，三萬人，綜合而言，他們整體約達到二十萬部眾。<sup>55</sup>

墨爾根濟農袞必里克和阿勒坦，征戰掠地、扶助叔伯子孫，愈益興盛。嘉靖三年（1524），左翼兀良罕部的圖類諾延（生卒年不詳）、格勒巴拉特丞相（生卒年不詳），偷襲外喀爾喀的7個鄂托克其中之一——住有達延汗十子格勒森吉（生卒年不詳）的次子、四子兩部，袞必里克兄弟立即出兵，追擊堂兄弟之敵至車臣汗部（今蒙古肯特北部），來回戰於戈壁、青海、甘肅達十年，逼得敵方之一——衛兀特部的博喇海太師（生卒年不詳），獻女兒給袞必里克作哈敦（皇后）。倚恃戰力威猛，袞必里克兄弟長年為小王子家族扶傾濟弱，聲名鵲起，但敵人迭起之因，還在於達延汗中興，統有全蒙古，相對使一些領主失去屬地，憤恨起而戰鬥，如博喇海太師原為蒙古右翼領主，正德十年（1515）奔青海，聯合同屬衛兀特部的永謝布領主伊巴賚，而伊巴賚即當年不服達延汗派次子來治理己部，殺害汗子、造成阿勒坦流離失所之人。<sup>56</sup>

嘉靖前期，袞必里克與阿勒坦的赫赫戰功，使三房獨傲群倫，讓統領薊遼沃土的長房博迪汗也起而爭雄，兩者均成明朝的邊防大患。他們深入朔州、延綏，要求貢市買賣，還參與嘉靖十二年（1533）十月的大同兵變，小王子博迪汗接受叛變明兵送的金幣、女妓，應約南攻。叛兵邀蒙人宴飲，請以代州為汗城，博迪汗如約兵臨山陝邊關，稍後，袞必里克兄弟掠陝西，雖未佔領，已驚恐明朝甚鉅。<sup>57</sup>嘉靖十七年（1538），達延汗兩房子孫之爭，因宿敵兀良罕部大掠博迪汗部而出現轉折，兩房立誓合作，出擊並收服了此世仇，戰後大會六萬戶蒙古於成吉思汗墓（白室）前，推博迪汗為首，上號庫登汗（又號阿拉克汗），袞必里克獲「墨爾

<sup>55</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19-23；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8-19、頁28、頁33。

<sup>56</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29-35。

<sup>57</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20-22。

根」之號，阿勒坦獲「索多」稱號。<sup>58</sup>

上述 16 世紀前半，這些蒙古草原上小王子家族征服諸部之戰，帶有強烈部落爭地、報仇爭雄的性質，各部視實力說話，財物掠奪則是戰爭一大誘因。

自忽必烈開始，蒙古大汗就很重視經濟資源，甚至倚此團結各部，作為統治利器，長城以南的富庶，尤具吸引力。<sup>59</sup>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墨爾根濟農袞必里克掠得山西一帶娼妓，縱慾過度而逝，年僅 37 歲，<sup>60</sup>輪到大弟嶄露頭角。「索多」阿勒坦正德二年十二月二十日（1508.2.1）生，年富力壯，擁有長年建立起來的戰功和威名，又是達延汗三房中存世最長者，順理成章為三房首領。蒙古傳統重視家族血緣，影響深著於阿勒坦人生，除自強不息外，父為達延汗接班人，亦使他與兄長在宗族中與眾不同，但他始終恪守倫序，如袞必里克居河套沃土，他便出居開原、代州、雲州等瘠地，不與兄爭奪，而是南掠明朝，另取財富。南朝資源總是草原游牧部落聯合的理由，尤其像嘉靖十六年底（1537）蝗災這樣的天災，往往草荒原枯，逼蒙人入絕境，被迫結盟向外劫掠，阿勒坦便在一次次集結，敵人、目標明確的戰爭之中，成為東蒙小王子外，最孚名望的西蒙雄主。<sup>61</sup>

阿勒坦威望長隆，來自於他從小征戰，數十年間持續扶助宗親、分享戰果。《阿勒坦汗傳》第 62 至 66 節寫道：

---

<sup>58</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34-40；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20。索多，意為「丈夫中之丈夫」，參見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卷 5，〈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 10。

<sup>59</sup>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204-248。

<sup>60</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42；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四十六年校本，第 3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0，〈諳達封貢〉，頁 3；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30-31。

<sup>61</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23-25；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 29；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 60，〈諳達封貢〉，頁 1。

(62) 其兄墨爾根濟農(袞必里克)已歸天，無所依賴的阿勒坦汗堅強地經星胡拉越山遠征，降伏仇敵博喇海太師于合魯勒哈雅(哈密等地)之林，將其賜予姪兒岱青諾延之情如此這般。(阿勒坦七弟博濟達喇的長子恩克達喇岱青諾延，明人作永紹卜大成台吉)

(63) 真誠聰慧的阿勒坦汗此役後未回，進擄練椎之民(錫賚兀爾人，明人作撒里畏兀兒)于巴彥尼庫(青海西北阿木尼尼庫山之南)，畏兀兒人覺之相繼來援而被擊潰，因其沮喪地承諾納貢置之於彼地。

(64) 額爾和圖(強者)聖者阿勒坦汗，貴體腱子中間負傷但無妨，擊敗驕橫來犯的錫賚兀爾，將其降伏令居彼地而還。

(65) 六大國(六萬戶)聚集于聖主之白室前，阿勒坦汗語于博迪汗曰：「賴天佑我使達新的博喇海太師于額真前向您叩降！」此時六萬戶盛贊福盛阿勒坦汗。(向博迪汗獻俘)

(66) 平定仇敵使為自己的阿勒巴圖(屬民)，使分離已久之眾跪倒于額真前，博迪汗等為報答勇敢真誠的阿勒坦汗，于額真前當六萬戶之面賜號曰土謝圖徹辰汗。<sup>62</sup>

隨後，阿勒坦又與三房弟侄瓜分來降的福餘衛、朵顏衛諸部，並於嘉靖二十三至二十五年(1544-1546)，再次戰勝兀良罕部不服者，功業達於鼎盛，且一併帶起四弟昆都楞汗拜薩哈勒台吉(老把都，1510-1572)、兄子諾延達喇濟農(1522-1572)、自己長子都古楞僧格諾延(後來的徹辰汗，又作車臣汗、黃台吉、乞慶哈、辛愛，?-1586)，於開原城大會蒙古右翼三萬戶，儼然草原上另一汗廷。<sup>63</sup>

降伏世仇兀良罕之戰，也可能是阿勒坦試圖與明建立貿易關

<sup>62</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43-46。

<sup>63</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9、頁46-48。這右翼三萬戶，就是阿勒坦控制的數字，參見同書，頁51。

係不成，又無法攻佔南朝，才轉向西發展。嘉靖二十年（1541）七月，阿勒坦派自幼服役於本部的漢人石天爵（生卒年不詳）為使者，至明朝山西大同的陽和衛，表達希望賞賚、貢市之意，巡邊御史史道（1485-1554）、譚學（生卒年不詳）也先後上奏開市益處，陳述阿勒坦主動制止部眾犯邊的行為，鼓舞朝廷接受市易以翦除北邊遭掠痼疾。明廷對此卻深懷質疑，索要小王子的正式國書，顯然不明白阿勒坦在蒙古已有的崇高地位和影響力，<sup>64</sup>獲得以下答覆：

漢與我（貢市），我即與小王子索降書，自是，漢耕塞以內，我塞以外。<sup>65</sup>

阿勒坦明言薊遼的堂兄博迪汗仍是全蒙古大汗，自己與汗廷也聯繫頻繁，透過貢市，他可不由搶掠便得到更多布疋等生活物資。他再三遣使希請通商，明朝卻屢次拒絕，大同總兵家丁董寶（生卒年不詳）甚至礮殺來使石天爵、肯切（生卒年不詳），以殺虜首功呈報，傳首九邊，終於惹到阿勒坦出兵，二十一年閏五月南攻山西太原示威，大搶一個月才退，破壞近四十州縣，侵害二十餘萬人。<sup>66</sup>這是明朝率爾回應引來的殺戮之烈。

宣大總督翁萬達（1498-1552）呼籲明廷正視阿勒坦求和互市一事，勿再因邊鎮家丁的莽撞行為，壞了國防要務，陷邊民於長年水火。他很沉痛地說：

弘治癸亥（十六年，1503）以前，歲猶稱貢羈縻不絕，疆圉稍寧。嗣因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虜益驕橫，貢道不

<sup>64</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251，頁3，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條；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天啟四年刻本，史部第26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170，〈北虜〉，頁53-54；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60，〈諳達封貢〉，頁5。

<sup>65</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1；另個說法則是「求進貢講和，自後，民種田塞內，虜牧馬塞外，各守信誓」，參見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卷170，〈北虜〉，頁59-2。

<sup>66</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262，頁2-3，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戊辰條；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卷170，〈北虜〉，頁55-2；同書，卷170，〈北虜〉，頁59-2。

通，諸邊侵駭，其結患生民者，已及四十年矣。嘉靖壬辰（十一年，1532），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後竟疑沮，邇年石天爵之事，其始也，彼以好來、蹇然諾之，既而設計誘取，斬之何名？大失夷心、橫挑巨釁，……今彼酋遣使叩邊講和求貢，雖譎詐之情、窺竊之計不可易知，然我惟備之而已。和則不可，來則勿拒，固帝王之所以待遠人。……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能知曲直喜怒，猶夫人也。……曲既在我，……將來即有畏慕威德、出于實心者，亦必回遑疑慮。<sup>67</sup>

可見弘治時，達延汗已曾頻繁南掠明朝，後來將近四十年間，也都是雙方互攻的局面，阿勒坦是第一位積極求和的蒙古首領。厭戰的嘉靖帝（1507-1567，1521-1567在位），採納了翁萬達之議，從雁門關稍事內撤，大修邊牆，配合火器，嚴守雲中外邊，以省十萬緡經費。<sup>68</sup>

從阿勒坦家族三代的奮戰史，可得此結論：達延汗中興，僅建立了一個薄弱的蒙古統合局面，往後，還要再經子孫半世紀的四出征戰，小王子家族才真正擁有穩固的統治者地位。雖然至阿勒坦稱汗時，達延汗系政權已趨堅實，但他們又循著蒙古族的發展慣例，從搏合一體，開始邁向另一個部落分化期。<sup>69</sup>

嘉靖二十年代初的阿勒坦，似乎已萌退志。他自幼逃難、就養於土默特部，青年起金戈鐵馬近三十年，經歷 45 次大戰役，從無片刻安寧，<sup>70</sup>而祖父達延汗、父賽音阿拉克汗、兄墨爾根濟農三位，俱逝於三、四十歲，剛要享受長年征戰果實之際，對他或有影響。此時，他已盡除父祖之仇——兀良罕部，收降蒙古其他不

<sup>67</sup> 明·翁萬達，《翁東涯文集》，收入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24，〈大虜求貢疏〉，頁7-8。

<sup>68</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09，頁4-5，嘉靖二十五年三月己卯條；同書，卷312，頁2，嘉靖二十五年六月己丑條；同書，卷312，頁4，嘉靖二十五年六月辛丑條；同書，卷313，頁10，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己卯條。

<sup>69</sup> Michael Burgan 著、溫海清譯，《蒙古帝國》（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15），頁45-90。

<sup>70</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78。

服達延汗子孫統治的部落，並在白室大會封汗，瓜分他部、提攜子侄，達成草原英雄的最高功業，竟於提鞭南指、數次深入明境之後，傾向築城耕種，嘗試定居，若非受漢人生活實境影響，至少已懷休養之意，甚至為此不從薊遼小王子南侵之約，聲稱自己希望貢市，不想入寇明朝。<sup>71</sup>

自百年前太師也先以來，蒙古各部大多希望拉攏明朝，威示他部，中年阿勒坦親見農業社會富庶景象，對他而言，此刻與明朝化敵為友、嘗試南人定居墾種的生活，都是比繼續從事征戰、掠奪更好的營生方式。當然，南朝物資更是阿勒坦想穩定獲得的，因此，有必要在明蒙交界的長城附近營造一個根據地，再逐步探索如何與明朝官方建立和平貿易市場，這也是歸化城興起的積極原因，當地不僅是他的大本營，更是他幼時的避難和成長之地。

### 三、歸化城的建立

歸化城所在的豐州，明朝成化十年時，已歸入蒙古勢力範圍，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出現了豐州城，或許與當時漢人降民助蒙人所築之城有關。<sup>72</sup>豐州地當漠南蒙古中部，因各部落與長城內地交易生活用品而興起，是漠北、漠西通向長城內地的交通樞紐，即今日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之舊城（呼和意指青色，蒙古象徵色；浩特意指城）。<sup>73</sup>

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豐州灘的阿勒坦汗，在明朝平虜堡附近建磚塔城、窯，用牛耕田 5、6 頃，生產穀、黍、蕎、秫、糜子等

<sup>71</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 7，〈俺答列傳〉，上卷 1，頁 35。

<sup>72</sup> 明·劉吉等修，黃彰健校勘，《明憲宗實錄》，卷 127，頁 1，成化十年四月己未條；同書，卷 266，頁 5，成化二十一年五月己巳條；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 274，頁 5-6，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庚午條；同書，卷 486，頁 1，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條；清·嵇璜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十二年刊本，第 632-6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73，頁 26，「歸綏七廳」條目。

<sup>73</sup> 那日蘇，〈清代歸化城土默特旗制的演替〉，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 8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頁 273。

物，有偃兵安息狀，明朝察知，也派平虜人出使，依蒙古敬奉大汗之禮，持白色的駱駝、馬、牛各9頭，邀阿勒坦入貢，雙方和平共處。<sup>74</sup>此豐州磚塔城，應是歸化城的最早雛型。此後，不知明朝制度的阿勒坦，一步步嘗試與明和議，建立互市關係，曾為定居築城，派五十騎到明朝大同右衛新設的助馬堡、鎮河堡一帶，索要木工、畫工、鐵工協助，溝通方式粗糙無禮，使者被明兵誘殺，北京也以來者無明成祖頒給瓦剌馬哈木的順寧王印誥，予以拒絕，阿勒坦遂怒攻懷來、雲中，雙方互有損傷。二十六年初，阿勒坦大會博迪汗、兄子諾延達喇濟農、弟把都兒台吉（?-1573），說明自己想互市歸田，<sup>75</sup>這次，他再度與明溝通如下：

以白馬1匹、扇馬3,000匹、白橐駝7頭，獻皇帝陛下，願遺我白段1疋、麒麟蟒龍9疋，我若得白段，即以為袍掛，大神道、它悉以自服，受漢皇帝賜亡窮，我豈復有它腸之可虞？請自今外塞稱臣，於是，東自遼東、西至甘涼，不敢以半馬匹策復至矣！<sup>76</sup>

阿勒坦汗似乎想帶同東西蒙古的小王子家族行事，而博迪汗、他、兄子等三大酋加弟侄等3小酋，代表全蒙古六萬戶，蟒袍布就是為大家要的。

阿勒坦汗與明互市之願，屢受明朝體制和蒙古各部意見分歧的阻撓。他沒有明朝所頒璽書，對此，總督宣大山西侍郎翁萬達

<sup>7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2-34。不過，也不排除是阿勒坦向明呈獻駱駝、馬、牛的九白之貢，參見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11，頁3，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條。

<sup>75</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4-36；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22，頁7，嘉靖二十六年四月己酉條；明·翁萬達，《翁東涯文集》，收入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224，〈北虜求貢疏〉，頁10-11。助馬堡、鎮河堡（或鎮川堡），參見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崇禎稿本，史部第17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第17冊，頁134；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卷126，〈大同〉，頁24。

<sup>76</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6-37。此為明人所記，阿勒坦汗原本語詞未必恭謙至此。

曾提議：讓蒙古先送人質南來，待嘉靖二十六年底，倘若確無入侵情狀，便可討論封貢。二十六年二月，阿勒坦再度致書大同總兵周尚文（1475-1549），因措辭草率，未被呈送北京；五月，他再集合弟、兒子，同居威寧海子（後來的歸化城附近），從大同鎮黑山門遞入蒙、漢文請貢書各三份，自誇武力，保證能制服遼東蒙古不南侵，威嚇明朝接受和議，速賜布疋等物。同時間，遼東博迪汗卻已離去，不再參與求和，蒙古各部則卜筮結果相異，分別要求在不同年份與明講和，阿勒坦也無法整合意見。明朝雖有翁氏方案，朝廷會議依舊不准，邊區又傳布各種流言，短期內同樣和議無望。<sup>77</sup>

阿勒坦多次要求互市，讓部分明臣認為蒙古索賞無度，應主戰鬥，益增雙方衝突。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阿勒坦搶掠北京，示威逼和，明廷緊急派出主戰的順天巡撫都御史王汝孝（生卒年不詳）守薊州，卻被擊潰，懷柔、順義因此拉緊報，幸而保定城有兵，才嚇阻蒙兵退去。<sup>78</sup>此戰使明君臣深刻體驗到阿勒坦之強悍，主和聲音再起，如長年在邊的大同總兵仇鸞（威寧侯，1505-1552）奏請恢復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邊市，<sup>79</sup>並分析理由：

<sup>77</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7-39；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11，頁3-4，嘉靖二十五年五月戊辰條；同書，卷313，頁5-6，嘉靖二十五年七月戊辰條。黑山門是大同鎮一處要塞，參見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90，〈梁震〉，頁61。宣雲口外是豐州灘、大小板升、歸化城、威寧海子、白海子、興和所、東勝、閣平等處，肥饒無比，阿勒坦與子孫以此為長居地，參見明·佚名修，黃彰健校勘，《崇禎長編》，卷27，頁19。翁萬達官銜，參見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08，頁1，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己丑條；周尚文官銜，參見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13，頁9，嘉靖二十五年七月甲戌條。

<sup>78</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39-412；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60，頁2，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壬午條；同書，卷363，頁1，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己亥條；同書，卷364，頁3-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乙亥條；同書，卷364，頁9，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庚辰條。王汝孝最後因守邊不力下錦衣衛獄，參見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64，頁1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乙酉條。

<sup>79</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62，頁4，嘉靖二十九年閏六月戊子條；同書，卷363，頁1，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己亥條；同書，卷364，頁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條。

俺答、脫脫、辛愛（前兩者俱阿勒坦子）、兀慎割據我大邊墩台，虜代軍瞭望、軍代虜牧馬，而故大帥周尚文又私使其部與虜市，而叛將王臣及亡命沈繼榮，輒撫而用之，以故，虜窺我虛實。……胡中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若或缺乏則必需求，需求不得則必搶略。……是以歲每深入，無不得利而返。往時，虜曾請貢，廷議未從，……投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不得已而為之也。<sup>80</sup>

仇鸞指出，明朝邊兵與蒙人交流已久，甚至互為戍守、幫助生計，實難寄望兩者戰時彼此廝殺，大將周尚文都不得以貨物安撫蒙人，何況蒙古人口滋生，亟需衣食鍋碗等物資，故每年南侵。他建議明廷，與其長年為蒙古人寇疲於奔命，耗資無數，不如開市貿易取代戰爭，滿足其民生需求，獲致雙方最大利益。

仇鸞言論很可能被歸為喪權辱國、備邊不力的託詞，但審度嘉靖局勢，是否只有戰鬥振國威這唯一選項？或者，明朝發展到16世紀，富庶繁榮，執政者的思維或外交上，已經可以有「商業滋益軍事」的選項了呢？

嘉靖朝軍力和君臣特性，決定了明蒙關係日漸往和平的一端發展。嘉靖帝好玄道，久不上朝，軍政要務長年懈怠，<sup>81</sup>主戰大臣言詞犀利，但或難禦敵，嘉靖帝也遲遲不決定是否准許蒙古貢市，大學士嚴嵩（1480-1567）呈上阿勒坦求和書後，皇帝命嚴嵩、禮部尚書徐階（1503-1583）等官集會討論。國子監司業趙貞吉（右春坊右中允，1508-1576）、錦衣衛經歷沈鍊（?-1557）等主戰，激昂陳述主辱臣死之詞，嘉靖帝大為動容，委派趙氏巡視行營、發放慰勞銀，他卻只對嚴嵩怒斥罵門，無整軍之計，最後寸銀未發，以欺

<sup>80</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42；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64，頁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丁丑條。

<sup>81</sup>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刻本，第3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61，〈謝鐸〉，頁11；明·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宣統鈔本，史部第5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卷31，頁11。

君罪名逮送錦衣衛牢獄；沈鍊則因詆毀嚴嵩父子，遭貶為民，入籍宣府鎮後，在當地開書院，糾眾痛批朝政，於三十六年（1557）被斬。<sup>82</sup>明軍壯盛無方，對蒙只能和平相處。

阿勒坦汗嘗試與明溝通，體驗農耕、定居生活的基地——歸化城，雛型出現在嘉靖二十年代左右，許多論文未注意到這點。<sup>83</sup>其後，重要轉折是嘉靖三十年（1551），阿勒坦屬部發生大量畜牲死亡、民人疫病之情，他認為此乃上天懲罰自己殺戮過多，便遣子脫脫（1531-1592）出使明朝，再次要求和議。宣大總督蘇祐（1492-1571）、兵部尚書趙錦（生卒年不詳）、大同總兵仇鸞等順勢，奏請開放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等處市場，以布帛、食物換蒙古的牛羊馬，說每年互市燕賞銀僅需 75,000 兩，可省大筆軍費。廷議後，嘉靖帝允開上谷新堡市，訂每年六月十五、十月二十為交易日，發皇帝內帑十萬兩，支應兩次開市，交太僕寺負責市務。阿勒坦聽聞消息，立刻宣布定居豐州，耕種為業。<sup>84</sup>這是明朝首次嘗試互市，雖次年即因豐州漢人慫恿阿勒坦南侵而告失敗，仇鸞亦死，<sup>85</sup>但已開市易之端。

開市既有成例，增加開放幅度的要求隨之興起。嘉靖三十一年初（1552），巡撫劉璽（生卒年不詳）建議明廷考慮邊市效益，查察上谷一地開市後即無戰鬥的改變，勿拘泥一年兩市的先例，改為單次市場貿易總額低於五萬兩銀、馬低於五千匹之數，擴大滿足

<sup>82</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上卷1，頁47-48、51；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59，頁1，嘉靖二十九年四月己亥條；同書，卷364，頁10，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午條；同書，卷364，頁15，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丙戌條；同書，卷451，頁4-5，嘉靖三十六年九月癸亥條。執金吾即皇帝左右侍衛，在明朝為錦衣衛。

<sup>83</sup> 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頁85-90；雲和義，〈北元至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由牧轉農的政策考探〉，頁5-6、頁10；森川哲雄，〈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歸化城〉，頁12-19；王得勝，〈居歸化城之土默特輔國公考述〉，頁59-61；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頁73-79。

<sup>8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1-3、頁5；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51。蘇祐官位，參見清·張廷玉等修，《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55-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202，〈聶豹傳〉，頁16。

<sup>85</sup>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18，〈世宗本紀二〉，頁241。

蒙人段布、米麥菽粟等需求。此議獲准，稍早，明廷也答應蒙使脫脫的請求，放寬交易獸群種類，將馬牛羊均納入，以兼顧蒙人普遍貧苦、手上僅有牛羊之情。面對明廷的善意，阿勒坦以制止弟弟把都兒台吉隨博迪汗南侵雲中一事回報。<sup>86</sup>其實，當年度（壬子年），47歲的阿勒坦正出兵四衛喇特，於控奎札卜罕地方力戰奈曼明安輝特部，遲至隆慶二年（1568）才收服，故必須與明朝和平相處，避免腹背作戰。<sup>87</sup>不過，嘉靖三十年代，明蒙仍互相猜忌、殺伐，僅嘗試互市。

歸化城與阿勒坦多方作戰又嘗試定居的腳步並進，緩慢成型於嘉靖後期。阿勒坦不識文藝，屢屢被相對多智機巧的明朝邊民以技藝打動，嘉靖三十三年初（1554），大同左衛的靜樂人呂鶴、趙全等，以白蓮教惑眾來歸，希求富貴，另有號「丘老祖」的鄉民丘富，亦藉占卜受到重視，轉引會匠藝的弟弟丘全，<sup>88</sup>他們幫助阿勒坦如下：

造起樓房三區，其壯麗；已造舳艫一艘，得渡河西，兵而東；已置農器、種禾，……（丘）富亦起室屋三區，治禾數十頃。<sup>89</sup>

從丘富一人的產業，可以想見土默特被這群漢人開發之巨，他們在三年間營造出5塔、8大板升（八大村），和植有穀薯、果木之

<sup>86</sup> 明·黃鳳翔，《嘉靖大政類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史部第5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下卷，〈北虜〉，頁54-55；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7、頁9。阿勒坦等退兵求和，亦云：「先遣鮑崇德齎咫尺之書，諭俺答，以紓平虜之急；繼遣龔喜等持一箭之令，詒黃台吉，以解大同之圍……盟約既定，二酋既從」，參見明·方逢時，《方司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321，〈為陳邊務申虜情以定國是以永大計疏〉，頁16。

<sup>87</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0；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卷6，〈額訥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頁17。

<sup>88</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6、頁13-14；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76，頁4，嘉靖三十年八月壬申條；同書，卷415，頁1-2，嘉靖三十三年十月甲戌條；同書，卷478，頁6-7，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條。

<sup>89</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14。

田，即今日呼和浩特市東郊的乃莫板村。<sup>90</sup>明人視這些投蒙的晉北鄉民為細作，其板升為間諜地，<sup>91</sup>實則諸板升早被阿勒坦封予諸子孫管轄，<sup>92</sup>但不可否認，他們為歸化城奠下基礎，也導引內蒙部落走向定居。

晉北鄉民居間挑撥，謀取個人最大利益，也造成嘉靖晚期明蒙戰和不定。趙全、李自馨等人屢次引介蒙兵深入山西，甚至北京，搶掠大批財物，此外，嘉靖三十三年左右，阿勒坦兩腿苦於疾病，需中藥材，可能也是入侵原因，明蒙沿甘肅、山西、陝西、北直隸之邊互攻，阿勒坦更命來投漢人，在山西大同鎮邊外築土堡，顯示他漸以豐州土默特部為長駐地。至嘉靖末兩年，趙全等役使漢俘虜修大板升城，想拱阿勒坦為帝，事雖未成，但阿勒坦長年聽從其言，頻繁搶掠內地，與明關係愈劣。趙全等還向南收集大木、工匠和萬餘漢民，在大板升城修宮殿、樓閣、倉庫，開墾雲田、豐州地達萬頃，形成數百漢莊，歸化城幾乎成型。<sup>93</sup>

隆慶四年（1570）八月，把漢那吉（岱青訥寨、大成台吉）奔平虜城投明，帶來明蒙長期和議的契機。<sup>94</sup>把漢那吉為阿勒坦汗三子圖伯特（鐵背台吉，生卒年不詳）遺孤，自幼由汗正妻帶大，頗受鍾愛，因與祖父生嫌隙而南奔，恰成明朝求之不得的重要人質。明大學士張居正（1525-1582）、總督王崇古以之為餌，要求出兵索孫的阿勒坦，搜捕趙全、李自馨、王廷輔等晉北降人，送還明朝，當

<sup>90</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52-55。

<sup>91</sup>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六年刻本，第138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海集2，頁23，「板升」條目。

<sup>92</sup>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漫集2，〈紀插酋戊辰入大同塞犯雲中略〉，頁1；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卷35，頁9。

<sup>93</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15-27；同書，卷7，〈俺答列傳〉，下卷3，頁5；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世宗實錄》，卷486，頁1-2，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條；同書，卷553，頁4，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壬午條；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車集2，〈插酋論〉，頁21-22。

<sup>94</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下卷3，頁1；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55、頁62、頁67；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穆宗實錄》，卷50，頁5，隆慶四年十月癸卯條。

年十一月中，阿勒坦踐約，在大同左衛以降人換回愛孫。這批長年引敵入鄉、動搖明蒙互市之人，終究不敵蒙古王孫的至親血緣，成為故里階下囚，受磔而死，富貴如煙。<sup>95</sup>隆慶五年（1571）二月，宣大總督尚書王崇古進一步請明廷趁機允准阿勒坦封貢互市，以平邊患，於是，明朝結束對蒙激戰，冊封阿勒坦及子姪，迎向和平。<sup>96</sup>值得一提的，這也是晚明對北邊蒙古各部實行羈縻政策、發放撫賞銀之始。<sup>97</sup>

明蒙和議既成，阿勒坦受封順義王，得到和平獲取漢地財貨的法門，為了弘揚佛教、擴大通商，隆慶六年（1572）起，他又大規模修城，至萬曆三年（1575）十月請明廷命名，稱「歸化城」，其晚年便定居城中，帶領蒙古右翼三萬戶與明貿易。<sup>98</sup>有學者言，阿勒坦建歸化城，是因明蒙每年僅在二月底至五月初互市一次，故藉此希望增加貿易次數和貨物量，補充日用不足，<sup>99</sup>唯據本節內容，嘉靖中期起，明蒙互市的日期和次數便持續變動、調整，不

<sup>95</sup>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卷7，〈俺答列傳〉，中卷2，頁35；同書，卷7，〈俺答列傳〉，下卷3，頁1-6；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7-72、頁369；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穆宗實錄》，卷58，頁8-9，隆慶五年六月丙辰條；同書，卷68，頁14，隆慶六年三月辛亥條。

<sup>96</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穆宗實錄》，卷54，頁2-7，隆慶五年二月庚子條；同書，卷56，頁6，隆慶五年四月辛亥條；同書，卷58，頁7，隆慶五年六月甲寅條。

<sup>97</sup>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穆宗實錄》，卷70，頁6，隆慶六年五月乙巳條；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四十八年刻本，集部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3，〈籌邊移稿序〉，頁10；明·方逢時，《方司馬奏疏》，收入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卷321，〈為陳邊務申虜情以定國是以永大計事〉，頁21；李華彥，〈林丹汗索賞與崇禎朝遼東撫賞政策之重整〉，《亞洲研究》，2010：10（大邱，2010.10），頁51-82。

<sup>98</sup> 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卷206，〈鎮戍三〉，頁16；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73-75；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12，頁5，萬曆元年四月丙辰條；清·金志節，《（乾隆）口北三廳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塞北地方第36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卷11，〈世紀下〉，頁22；清·吳炳纂修，《（乾隆）應州續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景印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第4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7，〈選舉志〉，頁16，「鮑崇德」條目；張威，〈從呼和浩特城市演變過程看綏遠城興建的意義〉，《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31：5（呼和浩特，2010.9），頁58。

<sup>99</sup> 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頁85-87。

是初始就固定每年僅一次，而是和歸化建城、阿勒坦帶領蒙人定居一樣，都是二十多年間逐步嘗試、妥協、發展所累積的結果，並非為拓展貿易才倏然建城。

歸化城早期的市場範圍，應是阿勒坦勢力所及的蒙古右翼三萬戶，甚至可能達於大汗所在的左翼三萬戶。歸化城土默特部本就是天然交通要道，隆慶和議後，更躍居長城外轉口貿易重鎮，阿勒坦家族在此將物資從明朝轉運到其他無權互市的蒙部去，益使之成為漢地商貿進入蒙古高原的大門。阿勒坦擁有明朝誥封的互市權後，商業作為政權的強力支柱，歸化城雖非明朝指定市場，但其他部落想與明通商，都必須到此領取他核發的證件，凡此種種，均鞏固了歸化城商貿中心的地位，交易繁盛，儼然蒙古最強部。<sup>100</sup>

歸化城的建立，還有一種說法：萬曆十四年（1586），明朝封順義王阿勒坦小妻三娘子（1550-1612）為忠順夫人，她在夫死後，相繼下嫁其長子都古楞僧格諾延、長孫楚魯克（扯力克），以確立二人的王位繼承權，國書上也與兩代汗王並稱，形成明蒙間的不成文規定：往後的順義王，都必須與她結婚。<sup>101</sup>楚魯克另娶阿勒坦孫、堂弟把漢那吉（岱青訥寨）之妻大成北妓，三娘子便另築城而居，明朝賜名「歸化城」，規制周逾三里、高逾三丈，南、北

<sup>100</sup> 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頁85-87；許檀，〈清代山西歸化城的商業〉，《文史哲》，2009：4（濟南，2009.7），頁119。

<sup>101</sup> 三娘子下嫁、與兩代汗王並稱或為之請封順義王，參見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187，頁4，萬曆十五年六月丁卯條；同書，卷189，頁7，萬曆十五年八月丙寅條；同書，卷468，頁13，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壬寅條；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222，〈鄭洛傳〉，頁9-10。三娘子本名烏訥楚，又被稱作鍾根哈屯、哈敦，即蒙語「中宮皇后」之意，是阿勒坦晚年的寵妻，多方參與阿勒坦興辦之佛事，生第七子博達錫里，明人寫作「不他失禮」。三娘子曾在萬曆十三年（1585）底，阿勒坦繼承人僧格都古楞汗黃台吉病逝後，藏匿王印和兵符，企圖立己子為王，故與黃台吉之子楚魯克（扯力克）鴻台吉不合，楚魯克自立為王，獲得繼承權，成為那木岱汗。參見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3-65；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228，頁3，萬曆十八年（1590）十月庚辰條。台吉為黃金家族男性之尊稱，黃台吉、鴻台吉，應為可汗之子的特稱，意同漢語「皇太子」，但蒙人不專指一位皇子，而是所有皇子都使用此稱號，參見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1。

兩門和東、西、南三關相通，各有門樓駐兵。三娘子是沃兒都司的塔布囊（駙馬）以上貴族女，名烏訥楚（諾顏楚），傳聞是阿勒坦姐之女、或外孫女，嫁給他作第三哈屯（蒙語「皇后」），對漢文化頗有好感，嘉靖時，與宣化巡撫吳兌（1525-1596）及其友徐渭（1521-1593）等親善，常視察互市地，對宣大開市、隆慶和議等重大事件貢獻良多。<sup>102</sup>

明代史料裡，三娘子扮演明蒙交涉要角的部分，可資參考，但涉及其私事之言，須斟酌使用。明初，漢人便知蒙古有兄弟間收繼婚習俗，<sup>103</sup>晚明人蔑視此俗，卻須仰仗連嫁數夫的三娘子溝通各蒙部，故記載她不會太正面，今人知道她曾長住歸化城，努力維持土默特部的對明貿易局面，與明督撫皆直通消息等事即可，毋須更作評價。她在世時，土默特確實一直是蒙古草原上最富強的勢力。<sup>104</sup>阿勒坦以降的土默特汗兼順義王，都不敢忽視她，萬曆三十九年（1611），她甚至想扶植親孫素囊黃台吉（生卒年不詳）任汗王，與阿勒坦長房玄孫卜石兔（生卒年不詳）及五路73位台吉抗衡四年，剽悍威猛。<sup>105</sup>三娘子共嫁五代、四任的土默特汗兼順義王，影響明蒙關係約四十年之久，夫序是：徹辰汗阿勒坦（1582.2 死訊到明）、僧格都古楞汗黃台吉（1583.3-1586.2.17 襲封順義王，1587.5 死訊到明）、那木岱汗楚魯克（1587.7-1607.4 襲封順義王）、晁兔台吉

<sup>102</sup> O.達日瑪巴斯爾，〈《對三娘子係衛拉特人之說的幾點質疑》證補〉，《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3（通遼，2015.5），頁6-15；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7。三娘子為阿勒坦外孫女之說法，參見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222，〈王崇古傳〉，頁9。

<sup>103</sup> 明·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內篇，卷1，〈哈烈〉，頁6。

<sup>104</sup> 如萬曆十八年十月，陝西總督梅友松就出示三娘子之信件，說明蒙古各部落內情；宣大總督揚時亨也曾氣憤說明三娘子要脅之事，參見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228，頁4，萬曆十八年十月甲申條；同書，卷421，頁6，萬曆三十四年五月丙戌條。三娘子直到萬曆二十、三十年代，都還是山西、陝西邊外最強勢力，參見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286，頁9，萬曆二十三年六月己巳條；同書，卷373，頁9，萬曆三十年六月戊申條。關於三娘子維持明蒙和平，亦可參見戴學稷，《呼和浩特簡史》，頁43-45。

<sup>105</sup>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485，頁6，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丙辰條；同書，卷503，頁13-14，萬曆四十年十二月庚戌條；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361、頁370。

(早逝)、卜石兔黃台吉(1611.6與三娘子成婚)。<sup>106</sup>

歸化城早期發展，還有阿勒坦想弘揚佛教的動力。他經營青海時，接觸到宗喀巴(1357-1419)改革後的黃教，嘉靖四十五年(1566)、萬曆元年(1573)兩次遠征藏區凱旋，都邀請藏地佛僧東來傳法，黃教當時與西藏舊派紅教競爭正烈，也樂於得到蒙古強者的支持。<sup>107</sup>明朝也樂見蒙古朝文化、禮儀轉變，萬曆三年十月，阿勒坦遣使透過邊鎮(應是離歸化城最近的大同鎮)，向明請要佛像、經文、蟒段和賜城名，舉止友善，兵部認其恪守盟約，禁諸蒙部興戰已五年，應予嘉獎，明廷遂賜「歸化」之名，賞給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彩段八表裏、銀三十兩，令邊鎮量力鑄給佛經、佛像等物，許諾阿勒坦，若能約束蒙部恭順無犯，每五年再賞一次。<sup>108</sup>賜物或小，卻顯示明蒙雙方和平互市局面可以穩定長存了，而年邁的阿勒坦受到同為游牧背景的藏傳佛教薰陶，漸擺脫動盪爭戰，傾心弘法，似乎想留給蒙古世界武功之外的智識和精神收穫。<sup>109</sup>

阿勒坦長年征戰，感受到蒙古人弱勢所在，晚年多病，開始

<sup>106</sup> 萬曆十年(1582)二月，阿勒坦死訊傳到明廷；十一年閏二月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黃台吉襲封順義王，十五年四月死訊到明；十四年，楚魯克繼承汗位與徹辰汗號，十五年六月至三十五年四月，楚魯克襲封順義王；三十九年五月十一日，卜石兔黃台吉與三娘子成婚；四十年七月，三娘子死訊到明，參見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121，頁1，萬曆十年二月癸巳條；同書，卷134，頁3，萬曆十一年閏二月甲子條；同書，卷185，頁1，萬曆十五年四月癸亥條；同書，卷187，頁8，萬曆十五年六月乙亥條；同書，卷432，頁12，萬曆三十五年四月壬子條；同書，卷485，頁6，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丙辰條；同書，卷497，頁8，萬曆四十年七月己酉條；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64、頁152、頁361。

<sup>107</sup>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8)，頁410、頁415、頁427。

<sup>108</sup>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43，頁5，萬曆三年十月丙子條。歸化城離大同鎮不到300里，參見明·佚名修，黃彰健校勘，《崇禎長編》，卷20，頁3。明廷許諾蒙部的五年一賞，後來也延遲兩次都未給予，參見萬曆三十九年七月：「先年所許金幣、蟒纈，十年未與，今當補給。」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485，頁6，萬曆三十九年七月丙辰條。

<sup>109</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08、頁114-115、頁117-118、頁122-124、頁133。

仿先祖忽必烈大興佛教與經典文化。<sup>110</sup>漢藏兩族原本看不起蒙人，認為他們原始野蠻難溝通，萬曆五年（1577），達賴三世受阿勒坦隆重邀請，從藏區親赴歸化城、蒙地講經弘法，還遭帕木竹法王雅爾隆汗（明封「闡化王」，名叫阿旺扎喜扎巴，?-1579）反對，說「彼蒙古地方乃無經無佛黑暗之地，食人肉、喝人血者多而有之，何可赴彼如同非人之區？若要親往教化，實屬困難之極，請以慈悲之心從全考慮。」但達賴三世基於照亮東方黑暗地的因緣，想將藏式和平施於漢蒙兩地，還是去了。<sup>111</sup>阿勒坦汗向佛也搭起漢藏間的溝通橋梁，萬曆六年（1578）二月，達賴東來效益展現，闡化王之子札釋藏卜（?-1623），差「番僧」到青海見達賴，就地對阿勒坦家族說法，勸化眾「達子」為善，並託阿勒坦汗代貢方物，向明朝請勅封。<sup>112</sup>上述措辭，表示明人蔑視蒙藏，藏人又輕視蒙人，但佛教適串起三者聯繫，明朝正視並鼓勵兩族興佛教化之舉，蒙人藉佛教與明增進交流好感，藏族則藉傳法機會，透過蒙人連絡上明廷，三方各取所需，和平自在其中。

蒙藏共倡佛法，對明朝的邊疆與文化交融，有百利而無害，故明人欣然看待阿勒坦、闡化王的請封和歸化城的佛教盛事。萬曆六年，明朝禮部認為札釋藏卜等知慕天朝封號，化桀驚之群，尊中國貢布之約，阿勒坦又讓他們相率歸化、代貢請，「番僧向化，撫虜恭順」，應予嘉許，特封西藏闡化王和部眾以大覺禪師、都綱等職，按級分賜僧帽、袈裟及表裡、食茶、綵段等物。<sup>113</sup>八年底（1580），阿勒坦汗再度遣使納款，請明廷為自建新寺勅賜廟名、再次確認藏僧覺義（生卒年不詳）為大覺禪師，均獲詔准。<sup>114</sup>這

<sup>110</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78-86。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1-10、頁409。

<sup>111</sup>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05-107；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頁443。

<sup>112</sup>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72，頁8，萬曆六年二月甲辰條；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頁107-108。明實錄中的「青海」，即蒙語中的「西喇塔拉」之地，就是青海大草灘。

<sup>113</sup>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72，頁8，萬曆六年二月甲辰條。

<sup>114</sup>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107，頁1，萬曆八年十二月辛

些來往表明，佛教使明、蒙、藏找到共通點，增加對話和了解，深化了和平根基，往下才延伸出數十年的歸化城榮景。

#### 四、結論

本文藉由理清 15 世紀北元大汗世系的順序和草原動盪，瞭解 16 世紀漠南草原再度繁榮的原因，特別是阿勒坦家族建立歸化城，並能長保興盛，卻非其他部落有類似發展的原因。

阿勒坦汗出身元順帝直系，是北元汗廷消失後，再次中興黃金家族勢力的達延汗之孫，也是繼承和發展達延汗功業最宏大的一支。北元汗位傳承七次，維持約八十多年，僅具表面一統之相，實無力控制蒙古各部，大汗也受權臣挾制，永樂元年，甘涼之外的瓦剌部首長馬哈木，與出身韃靼部的北元鬼力赤汗同時通貢明朝，則是蒙古出現東韃靼、西瓦剌分別之始。15 世紀中，馬哈木之孫太師也先，結束了北元汗廷，自稱可汗，開啟往後百年蒙古可汗傳承失序、各部亂如散沙的時期，明朝則以個別分封、離間制衡之策對付，於山西大同地面築堡防禦，積極建設軍事，收效頗大，此亦隔鄰歸化城土默特地區（漠南蒙古）再獲開發的契機。

也先僭稱大汗後長駐漠南蒙古，形成明代中期的最嚴重外患，著名的蒙古「小王子」，不只一位，是明人對北元終止後的蒙古大汗之稱，便始自也先後輩，但即使只承認黃金家族汗統的明朝，也不清楚每位小王子的正宗與否。明人《萬曆武功錄》以「小王子」稱 7 位可汗，但蒙人是否如此稱呼，不得而知。7 位可汗間的關係，參照 17 世紀初成書的蒙人《阿勒坦汗傳》，可以發現，明人認為繼承兄長把禿猛可之位的第四位小王子伯顏猛可，為達延汗（大元汗），是混淆了他與父親的名字、關係，實則達延汗名巴圖孟克，是黃金家族汗系僅存的支脈子孫，又娶滿都魯汗繼妻滿珠海，才由東韃靼、西瓦剌（衛喇特）聚會，共推為大汗，這段歷史輪廓，須仔細對讀明蒙這兩本古籍，才能理解，而

同一時間草原上只會存在一位代表全蒙古的正宗大可汗，別無分號，亦是必須知曉的蒙古習俗。

15世紀中到16世紀中「小王子」家族的興衰，正是阿勒坦汗的先世動態，也是豐洲灘土地重興、歸化城建立的由來。阿勒坦汗嚮往並將蒙古族的游牧征戰，日益導向農商定居的生活模式，受到祖父達延汗中興事業的影響很大，後者重新確立汗廷、統合諸部，卻引來子輩顛沛戰鬥的命運，直到孫輩，才真正達成最終的征掠勝利。特殊的是，戰力最強、功業最大的阿勒坦，也是率先看見城市、定居、貿易、佛法之益的人，希望結束軍事，對明貿易，獲取物資，使興盛的政權可以長久維持下去。

達延汗共有十一子，其後的蒙古大可汗系統確立在其長子一脈住牧的察哈爾高原，而蒙古草原其他地方與青康藏高原，都是小王子家族和蒙古人活動之處。達延汗三子巴爾蘇博羅特成家後，受亂逃往父汗駐地，阿勒坦因此長於蒙郭勒津土默特部，日後又率該部兵馬與宗族長年合作，擊潰世仇衛兀特部、收服鄂爾多斯部。巴爾蘇博羅特曾任蒙古右翼三萬戶濟農，控有蒙古一半勢力，達延汗逝後，還短暫當過蒙古大汗，這些都是阿勒坦的功業資本。阿勒坦與兄袞必里克，即明人所稱的「吉囊」、「俺答」，因父早逝，必須不斷透過戰鬥以自立自強，後來又一路扶助宗族，分享部眾和財富，聲望崇隆，是蒙古最強勢力，故阿勒坦得以稱汗，但僅是支系小汗。「吉囊」一詞，來自袞必里克接父之位，擔任右翼濟農。

約當明朝嘉靖中期，中年阿勒坦汗功業達於鼎盛，以豐洲灘為根據地，控有蒙古右翼三萬戶，聲勢超過察哈爾汗廷。值得注意的是，他雖是蒙古最盛武力，仍無法匹敵明朝整體，草原世界也依舊處於大小領主互為統屬的狀態。阿勒坦沒有明朝封誥，不能貢市，因此，即使嚮往定居、宗教生活，想藉由貿易獲取漢地物資，卻不得其門而入，只能以戰迫和，攻擊明朝，激起雙方極大的誤解與殺戮仇恨，延宕其願望約二十餘年。

明蒙和議固由於蒙古新勢力不明漢制、外交手法粗糙所致，

明朝體制僵化、執政者不夠靈活，也有以致之。明人期待蒙古代代相傳、珍重永樂時期頒發的王爵封誥，持以為通商憑證，忽略北元汗廷已逝，草原分崩離析、群雄並起近百年的事實，用相同標準要求阿勒坦汗，衝突自可預期，由此也知，明中葉墨守舊制成憲，未適時改變，對外關係上，嘉靖中央與前線實境中的督撫、將軍，有兩套不同的思維和做法，但面對阿勒坦數次入侵北京或山西之舉，卻同樣解決不了。事實上，明朝中後期北方邊境已常見漢蒙互助，開放市場利大於弊，雖在傳統價值觀上不免有損天朝上國尊嚴，但透過每年數萬兩銀、次數有限的邊市貿易，可大減蒙古搶殺，又能補給草原馬匹，是筆划算的生意。

隆慶五年明蒙和議成功，表示雙方主政者終於認可和平貿易將有益處，後來來萬曆時期數十年的富庶繁榮，部分應當歸功於此。但始自嘉靖末、皇帝出資用於邊市貿易的燕賞銀（或撫賞銀），至 1620 年代末的崇禎朝，竟暴增到數十萬兩，就是明廷自身控制失調，無法應付蒙人欲求的問題了，而且很顯然地，嘉靖時邊鎮管理懈怠、兵力弱的狀況，未獲修正。

南朝物資是阿勒坦汗的首要目標，因此，他以豐洲灘為根據地後，積極接納晉北來投漢人，助己建設村寨、開墾田地，歸化城前身——大板升城逐漸成形。阿勒坦又一步步探索與明官方互市的方法，以穩定獲取物資，這便是歸化城土默特部興起的積極原因，此地也正是他幼年成長之地。歸化城作為內蒙古地區再度繁榮起來的表徵，還有位於漠南中部、近長城，是漠北、漠西通往明朝的交通樞紐等先天優勢，使得它比蒙古其他地區更繁榮，有更多的建城需求。該城最早起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阿勒坦汗在豐州蓋磚塔城一事，此後，隨著他與明朝多次反覆嘗試和議，戰爭與和平迭見，大板升城也日成於晉北降人和漢俘之手。期間，來自明官方的政策或協助甚少，多是漢民自與蒙古外交的模式，出於阿勒坦汗支持和推動的占大部分。

作為蒙古六萬戶裡聲勢最盛、輩分最大的首領，阿勒坦欲模仿先祖忽必烈政教合一、鞏固土默特政權的動機，是可以理解

的，他也成功地將佛教重新引入草原，並以歸化城為推動中心，為蒙古文化注入新生命力。阿勒坦汗在弘揚佛法上的建城需求，恐怕更超出貿易之上。總結起來，歸化城的出現，起於嘉靖中，完成於萬曆初，推動者是阿勒坦汗，實際建設者是漢人，尤其是山西北部投靠蒙古的漢民，而歸化城土默特部興起之因與象徵意義，則是漢、蒙兩大民族藉貿易而和平共存，復因佛教而增進交流，甚至聯絡藏族的重大轉變，此結果，無論對東亞大陸任何一族而言，都是最佳的局面。

（責任編輯：齊汝萱 校對：陳品伶、謝孟廷、林晉葳）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明·方孔炤，《全邊略記》，《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刻本，第 7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王鳴鶴，《登壇必究》，《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刻本，第 960-96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尹守衡，《皇明史竊》，《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刻本，第 3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申時行等修，《大明會典》，《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萬曆刻本，第 789-79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艾穆，《艾熙亭先生文集》，《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萬曆刻本，伍輯第 2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佚名修，黃彰健校勘，《崇禎長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何喬遠，《名山藏》，《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史部第 47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明·茅元儀輯，《武備志》，《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天啟刻本，子部第 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明·范守己，《皇明肅皇外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宣統鈔本，史部第 5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徐學聚，《國朝典彙》，《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天啟四年刻本，第 26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陳九德，《皇明名臣經濟錄》，《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嘉靖二十八年刻本，史部第 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明·陳文等修，黃彰建校勘，《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陳子龍編，《明經世文編》，《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第 22-2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明·陳仁錫，《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六年刻本，第 138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陳全之，《蓬窗日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嘉靖四十四年刻本，第 11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陳建，《皇明通紀法傳全錄》，《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崇禎九年刻本，第35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陳建，《皇明通紀集要》，《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崇禎刻本，史部第34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明·陳誠，《西域行程紀》，《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景印明抄本，第106冊，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明·陳誠，《陳竹山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雍正七年刻本，集部第2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陳懿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四十八年刻本，集部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建校勘，《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張居正等修，黃彰建校勘，《明穆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黃光昇，《昭代典則》，《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萬曆二十八年刻本，史部第12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黃鳳翔，《嘉靖大政類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史部第5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5。
- 明·馮夢龍，《智囊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明刻本，子部第13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天啟刻本，第53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建校勘，《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楊士奇等修，黃彰建校勘，《明宣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續修四庫全書》景印清初刻本，第1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廖道南，《楚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嘉靖二十五年刻本，第47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鄧元錫，《皇明書》，《續修四庫全書》景印萬曆三十四年刻本，第31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明·劉吉第等修，黃彰建校勘，《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明·劉效祖，《四鎮三關志》，《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四年刻本，史部第 1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 明·蔡憲臣，《清白堂稿》，《四庫未收書輯刊》景印崇禎刻本，陸輯第 22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 明·瞿九思，《萬曆武功錄》，《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萬曆刻本，史部第 35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
- 明·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景印崇禎稿本，史部第 172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
- 明·顧秉謙等修，黃彰建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
- 蒙古·佚名著，珠榮嘎譯注，《阿勒坦汗傳》，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 清·小徹辰薩囊台吉，《欽定蒙古源流》，《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五十四年校本，第 14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清·吳炳纂修，《（乾隆）應州續志》，《地方志人物傳記資料叢刊》景印乾隆三十四年刻本，第 44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四十六年校本，第 3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金志節，《（乾隆）口北三廳志》，《中國方志叢書》景印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塞北地方第 36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 清·張廷玉等修，《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5-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嵇璜等奉敕撰，《皇朝文獻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景印乾隆十二年刊本，第 632-6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二、專書著作

- Michael Burgan 著、溫海清譯，《蒙古帝國》，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2015。
- 札奇斯欽，《蒙古與西藏歷史關係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8。
- 田山茂，《清代蒙古社會制度》，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5。
-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黃麗生，《從軍事征掠到城市貿易：內蒙古歸綏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14 世紀中至 20 世紀初）》，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
- 黃麗生，《論《阿勒坦汗傳》的撰史意識》，臺北：蒙藏委員會，1997。

戴學稷，《呼和浩特簡史》，北京：中華書局，1981。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London: Cambridge, 2005.

### 三、期刊論文

O.達日瑪巴斯爾，〈《對三娘子係衛拉特人之說的幾點質疑》證補〉，《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3，通遼，2015.5，頁 6-15。

王得勝，〈居歸化城之土默特輔國公考述〉，《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7：4，呼和浩特，2005.7，頁 59-61。

牛淑貞，〈明末歸化城商貿地位的形成及其發展〉，《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5：4，呼和浩特，2013.7，頁 85-90。

白初一，〈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兩旗職官及戶口初探〉，《昭烏達蒙族師專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13：1，赤峰，1992.4，頁 74-80。

李華彥，〈林丹汗索賞與崇禎朝遼東撫賞政策之重整〉，《亞洲研究》，2012：10，大邱，2010.10，頁 51-82。

那日蘇，〈清代歸化城土默特旗制的演替〉，收入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 8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6，頁 271-298。

唐玉萍，〈俺答汗在明代蒙漢關係中的作用〉，《社會科學輯刊》，1996：6，瀋陽，1996.11，頁 107-112。

張威，〈從呼和浩特城市演變過程看綏遠城興建的意義〉，《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31：5，呼和浩特，2010.9，頁 57-60。

森川哲雄，〈十七世紀前半葉的歸化城〉，《蒙古學資料與情報》，1985：3-4，呼和浩特，1985.12，頁 12-19。

許檀，〈清代山西歸化城的商業〉，《文史哲》，2009：4，濟南，2009.7，頁 119-129。

雲和義，〈北元至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由牧轉農的政策考探〉，《內蒙古農業科技》，2013：2，呼和浩特，2013.4，頁 5-6、10。

劉曉梅、馬曉麗，〈國內二十年來俺答汗研究述評〉，《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9：3，煙臺，2016.5，頁 77-84。

鍾梅燕，〈俺答汗與蒙藏民族文化變遷與認同——一個民族文化「引入」的個案〉，《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1：3，蘭州，2013.5，頁 30-35。

## The Little Prince, the Tumote Trib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uihua City

Lee, Hua-yen\*

###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Guihua city (now known as Hohhot)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during the Jiajing era (1522-1567)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Longqing (1567-1573) and Wanli (1573-1620) eras, the city grew in size and was fortified with city walls. Until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an important juncture linking the Mongolian grasslands to the north and China to the south. The city has historically also been an important center for both commerce and Tibetan Buddhism.

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discussing the evolution of Guihua, few of them have considered the role played by the Mongolian tribe known as the Tumote in the city's history. In this paper I seek to remedy this gap in our knowledge by examining *The Biography of Altan Khan* (阿勒坦汗傳), a work originally written in Mongolia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subsequent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The Biography of Anda Khan," a chapter from the Ming-dynasty work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of the Wanli Emperor* (萬曆武功錄·俺答列傳).

What I have found is that Altan Khan (阿勒坦汗), descended from the Golden Family of Genghis Khan, was a key player in the formation of Guihua. His grandfather was Dayan Khan (達延汗), who reunited many Mongolian tribes some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Yuan dynasty (1368-1635). His father, Khan of Baersu Boluote, inherited Dayan Khan's seat and wanted Altan to be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nobles. Altan Khan was successful in war and strengthened the power of the

---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Liberal Education, Shu-Te University

Mongol tribes; but after reaching middle age he settled down to an agricultural life. He tried many times to establish commercial ties with the Ming court, and was finally successful after signing the Longqing Agreement, which allowed the Tumote to become even wealthier than the Mongolian Khan in the Chahar Plateau. This article also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sen (也先) family of the Wala tribe and the Dayan Khan,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Altan Khan (also known as “the Little Prince”) and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Guihua as a commercial center.

**Keywords:** Hohhot, Altan, the little Prince, Mongolian history, commerce

